

2100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个“据说”成了真的故事，就是年轻的孔子专程从鲁国去齐国，向老子学习“礼”。学成临别之际，老子对孔子说，我听说富贵的人送人是用财物，仁德的人送人是用言辞。我不能够富贵，却盗取了仁人的名号，就说几句话送你。老子说的是：“一个聪明又能深思明察的人，却常遭到困厄，几乎丧生，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识见广大的人，却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后果；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属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本身。”

老子、孔子可能无意看高自己，他们的见与不见，交流求证与否，说些什么有没有用，早都已是苍凉云烟随风而去，湮没于两千多年的大浪淘沙，杳杳像遥不可及的苍穹边沿。太史公也绝对没有想到，老子送了孔子什么话，有没有送，甚或见没有见着，都几乎不是后人关心的重点。倒是为师者语重心长地叮嘱、悟道者满怀忧思地启发、权重者居高临下地关怀、得志者势大力沉地指示，以名人的千古赠言、帝王的金口玉言、哲人的金玉良言、智者的不朽名言及其种种化身变形，绵延浸润于千年流变的中华文明之中，“诲人不倦”顽强生存，熠熠生辉“千古流芳”。

君不见，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及几十年后汉朝武帝的独尊儒术，直接在同一片蓝天之下厚土之上，把古中国发展建设的指导思想来了个A/B面的底朝天大翻转，其实质不外乎统治者为黎民百姓定规矩，必须听什么话，走什么路。这样的把戏一路沿袭，直至20世纪的新生活运动，也还总在希冀刚刚剪掉辫子脱下长衫的国人顷刻西装革履刀叉觥筹，其间眼花缭乱种种手法，不过是间或的翻新而已。

登高台而望东海

君不见，增广贤文、诸子文粹、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各类经过严密甄选的文化“精品”在孕育一代一代合格士大夫、芸芸众生者的同时，顺便流逝了饱满充盈争锋创新、姿色各异多元共存、奇幻绚烂绮葩瑰丽的宝贵基因？

君不见，父母必读，孕妇必读，小学生必读、中学生必读、大学生入学必读，文科生必读，理科生必知，留学必读，退休必读，养老必读，从你的孕育出生到生老病死，各式各样的必读必知必行必做必为必须都必将与你相伴终生如影随形。

君不见，从皇帝到大领导，从大领导到小领导，从官宦到形形色色的名人精英；从古代到今朝，从个体到机构，乃至蔚为大观的成千名人扎堆的智库，名目繁多花样乱眼的荐书，推广，介绍，穿越了时空，泛滥于神州，蓬勃地成长。

重压之下必有反弹，长年饱餐也会消化不良。有幸经历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回望历史长河，我们可以看到，“少年不识愁滋味”略显孟浪，“老夫聊发少年狂”稍微张扬，“但使残年吃饱饭，只愿无事常相见”又有些黯然神伤。直面纷乱现实，我们能够感觉，闭上自己的眼睛，就关上了全部的门窗，于是可以听从自己的心声，静思默想那终点和方向。回应责任担当，我们应当回到原点，相信别人的大快朵颐，填补不了自己的辘辘饥肠；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一步一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才能成一家之言，千古之绝唱。

我们当然更可以相信：“如果你想要造一艘船，不要招徕你的手下收集木材、发号施令或分配工作，相反，去教他们渴望无尽的大海。”

从此刻开始，时间看得见。

从此处了望，大海看得清。

□ 蝉羽

巴蜀史志

(双月刊)
2016年 第5期
(总第207期)

主管单位：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主办单位：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编委会主任：马小彬

副主任：王孝平

编委会：

马小彬 王孝平 高志刚

陈思禄 李冠华 邱俊

李思源 余正道 王少卿

周正琴 余崇威 秦伟民

夏建平 李勇 譙小松

冉炬 罗之聪 师伟

杨文 李卫东 刘佳礼

刘启蓉 尹克发 邓瑜

陶利辉 熊倩 高伟明

何晓波

主编：马小彬（兼）

副主编：王孝平（兼）

编辑出版：《巴蜀史志》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熊倩

执行编辑：吴琨 谢灵慧 刘艳平

封面题字：何海霞

本刊地址：成都市永兴巷15号21楼

邮政编码：610012

编辑部电话：(028) 86522061

编辑部邮箱：bsszjb@163.com

印刷：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28)86980225

注：本刊如有印刷问题请与印刷企业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卷首

01 登高台而望东海 蝉羽

时政辑要

04 领导同志谈地方志工作

05 念好四字诀 下足真功夫 求得实效果

——四川在全国地方史志期刊工作会上交流经验

封面故事

07 新闻巨子——范长江 内江市东兴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1 也说“书画之乡”——内江 魏东

15 三里一糖坊 五里一漏棚
——小记内江糖坊 向思宇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20 毛泽东长征诗词中品读中国精神 罗雄

24 巴山红,最忆是通江 伍松乔

口述历史

28 人民公仆 光辉照人
——怀念李子元同志 雷新乾

蜀中人物

- 32 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与自贡久大盐业 曾永贵
36 唤起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对周敦颐的记忆 周庆

史料之窗

- 40 皇甫录《下隍纪谈》的地方史学价值述论 卿远明
44 从犍为郡的汉化过程看巴蜀在西南夷开发中的作用 石璞

读志用志

- 48 《蜀藏》序 高志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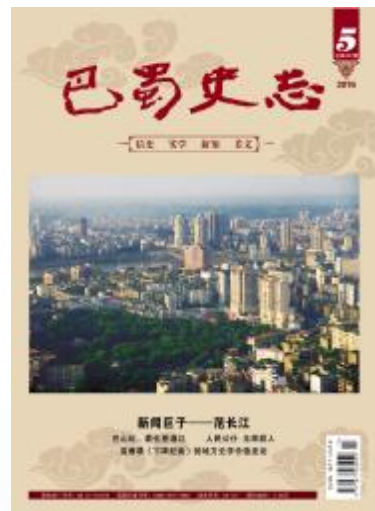
志鉴研究

- 50 《李庄镇志》与中国名镇志丛书之《李庄镇志》述评 李华蓉
52 家谱编修和地方志的殊途与联系
——以营山县近二十年家谱编修为例 范虎

志者情怀

- 55 真情守望三十载 陈文
57 七旬老人牟百均带病坚持写村志 张胜开 陈春秀

方志资讯



封面：内江新城

出版时间 2016年10月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671—265X
国内统一刊号 CN 51—1616/K
邮发代号 62—311
国内发行 四川省报刊发行局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临许(2001)153号
定 价 7.00元

本刊部分图片系资料图片，请作者与本刊联系以奉稿酬

领导同志谈地方志工作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到新疆调研地方志工作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地方志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修志编鉴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修志编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

要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充分认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做好地方志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做好地方志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八到位”中第一个

要到位的。认识提高了，重视了，工作才能抓上去。

要切实加强领导，不断加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第一，要加强党对地方志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提出来，在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中把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也作为一个重要原则提出来，因此，在地方志工作中一定要体现党的领导。怎么体现？就是要把党中央的指示、要求真正吃透，树立看齐意识，切实抓好落实。要主动

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主动向地方党委汇报地方志工作，按照地方党委的要求做好地方志工作。第二，要加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从2015年开始，中指组就把培训地方志人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地有条件的也要组织培训。

要增强精品意识，进一步提高志鉴编纂质量。地方志工作要把质量放在首位，树立精品意识，把质量为先贯穿于志书编纂出版的全过程，创造出更多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名志佳鉴，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把好政治关。就是要把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放在首要地位，不要出政治错误，不要违犯四项基本原则，不要出现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不要把错误的东西写到志书里。第二，要把好史实关。修志不是编故事，不能像电视剧那样搞什么戏说，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遵照志书的要求来编写。第三，要把好文字关。文字上一定要过硬，不要有错别字，这是最低要求。

(本刊综合)



念好四字诀 下足真功夫 求得实效果

——四川在全国地方史志期刊工作会议上交流经验

本刊讯 9月27日，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承办的全国地方史志期刊工作会议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中指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张国春、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杨凯出席会议并致辞。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工作机构期刊分管领导、主编及相关部门专家学者约120人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讨论了中指办起草的《全国地方史志期刊工作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期刊处处长刘普介绍了社科院期刊工作情

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编辑部历史学科执行主编柴英介绍了人大复印资料选刊选文情况。吉林、山西、上海、四川、武汉作主题发言。

邱新立在讲话中指出，地方史志期刊是全国地方志工作重要交流平台和宣传阵地。自新编地方志工作大规模开展以来，地方史志期刊即始终承担着指导修志业务的任务，发挥着经验交流平台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方志理论研究的繁荣，推动了方志学学科的发展，加强了方志文化的传播，扩大了方志事业的影响，为两轮修志顺利开展与地方史志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各级领导和地方志工作

机构的支持和推动下，全国史志期刊呈现出数量大、覆盖广、促工作的良好局面，质量逐步提高，学术化、规范化、多样化明显进步。但仍存在统筹规划亟待加强、编辑管理不够规范、编辑队伍业务素质有待提高、期刊影响力不强、期刊传播渠道不畅等问题。他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史志期刊工作提供有效保障；加强统筹规划，促进史志期刊方阵发展壮大；提高办刊水平，提升史志期刊的影响力；明确史志期刊定位，创新史志期刊开发利用工作。

四川地方志近年来的宣传、期刊工作得到中指组及其办公室充分肯定。按照会议安

排，四川省地方志办以《以古鉴今以文言志，有声有色有为有位》介绍了做好期刊工作的经验；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以《念好四字诀，下足真功夫，求得实效果》为题做大会经验交流，介绍四川地方志宣传工作情况。王孝平在发言中说，近年来，四川方志系统坚持“哪里有工作，哪里就有宣传”；坚持“人人都是宣传主体、事事都有宣传亮点、时时都有宣传机遇、处处都成宣传窗口”，通过制发文件定规矩，会议造势定任务，责任到人定目标，在“快、准、深、活”上下功夫，地方志宣传、期刊工作有作为、有成效、有地位。他重点介绍了宣传重大突发事件，求“快”；宣传重要时政热点，求“准”；宣传方志行业优势发挥，求“深”；宣传地域文化工作特色，求“活”的具体做法和工作案例。

从会议期间举办的全国地方志史志期刊展示活动获悉，四川省参展期刊26种，约占参展期刊的20%，包括：全国9个公开出版史志期刊之一的《巴蜀史志》，以及市（州）志办主管主办内部资料10种，县（市、区）志办主管主办内部资料15种。据统计，四川省共创办省市县三级史志期刊36种，约占全国现有史志期刊的15%，为全国史志期刊成果最



多的省份。

9月28日，中国地方志学会史志期刊研究会（以下简称史志期刊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地方志学会史志期刊研究会规程（草案）》《中国地方志学会史志期刊研究会会员登记办法》《中国地方志学会史志期刊研究会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产生办法（草案）》，产生了史志期刊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共有理事73名。一届一次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40名。随后召开的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议，研究提出并顺利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

邱新立会长在讲话中指出，成立史志期刊研究会，加强期刊工作，顺应了全国地方

志事业发展的大趋势，符合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实际，符合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要求，也是地方志系统尤其是各级史志期刊编辑的心声和期盼。他强调，做好研究会的工作，离不开每位理事、尤其是常务理事的辛勤付出和大力支持，希望各位理事积极参与研究会今后组织的各项活动，多为史志期刊健康持续发展建言献策。中指办、中国地方志学会也将积极为研究会的工作创造条件，以期最大程度发挥史志期刊研究会的作用。邱新立就史志期刊研究会今后五年的工作谈了四点设想：一是积极助力各级史志期刊充分发挥平台和阵地作用；二是积极推进方志理论研究，组织会员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三是加强作者、编辑和发行队伍的建设；四是尽快完善研究会的组织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

新闻巨子——范长江

□ 张维亚



范长江故居全景（段瑞明摄）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市东兴区（原内江县）田家镇赵家坝人。26岁时，以长江笔名写作，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他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个揭示西安事变真相；第一个采访“红都”延安，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7年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8年与胡念之等创办国际新闻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与廖承志等创办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1942年创办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报》和新华通讯社

华中分社，任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社长；1946年，创办我党第一所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并任校长，5月赴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10月国共谈判破裂后撤回延安，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委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同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1950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54年调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此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职。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范长江于1970年10月23日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为表彰范长江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该奖项是表彰奖励我国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最高奖。国务院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成立时间——11月8日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少年立志 志存高远

范长江的幼年，由清末秀才、博通诗文的祖父启蒙。范家是四世同堂的大户人家，有房屋二十多间，田地两处。到范长江六七岁时，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范氏家业也难逃厄运，日趋没落。

到范长江上学时，家境已十分困难。他只得靠母亲做针线活辛苦挣得的工钱和平日自己积得的微薄压岁钱，走进学校。幼小的他十分懂事，非常珍惜这份读书机会，学习十分用功。幼年的艰辛生活，历练出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

1923年，范长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江县立中学。随着大革命时代的到来，范长江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团员李原岷、刘惠、邓崇禄在县立中学组织“警觉青年谈话会”。“谈话会”每星期举办一次，主要学习由广州寄来的有关三民主义等内容的报刊，也到校外做一些宣传，如贴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

1926年秋，范长江告别家人，离开家乡，去资中的四川省立第六中学商科班求学。1927年初，离开资中，沿沱江顺流而下赴重庆，就读于吴玉章开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

苦寻出路 颠沛流离

1927年3月31日，范长江和同学们参加了重庆数万名工人、学生、市民在打枪坝的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等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这次集会，被蒋介石暗中指使的四川军阀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重庆全城充满着暴力和血腥。反动派四处通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中法大学被封闭，范长江与同学秦澜波逃脱，躲在姑父家，等待时机离开重庆。6月，范长江乘轮船去了武汉，居住在汉口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专门接收重庆学生的救亡招待所。当时的武汉天天都有各种集会和游行示威，范长江积极参加，同时也有些茫然，徘徊于街头，看着匆匆行人的背影，不知出路在哪里？他渴望功名成就，心有不甘。回家去，无颜面对家乡父老，自己的理想又怎能实现……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决定投笔从戎，追随革命潮流去实现理想。7月10日，范长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学生营，随部队开拔江西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随部队跋山涉水进军

广州。9月，在潮州抵抗桂系军队的战斗中，部队被打散，范长江流落到汕头，但仍想方设法去寻找部队。在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居无住所的境况下，范长江几乎沦为乞丐，很快病倒街头，奄奄一息。翌日，收尸的人发现他还一息残存，施药搭救，才幸免客死异乡。

1928年夏，范长江在南京报考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选学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壤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现实很快击碎了范长江的理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国民党却节节败退，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看到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学校又漠然置之，范长江痛心疾首，朴素的民族感情促使他要捍卫中华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统一。被激怒的范长江选择在学校晚上集合点名时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同学们团结起来解救面临亡国的国家。随后，他毅然与国民党决裂，抛弃学业，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

1932年初，范长江到了北平，在黎锦熙主持的国语大词典编撰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9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在此期间，他一面刻苦攻读，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多次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经常冥思苦想：如何用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解决积累的思想问题，弄清中国的出路和个人出

路的问题。他向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哲学只是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于是，范长江决定一边读书一边投身现实的抗日战争。

1933年初，范长江参加了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又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下半年，他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益世报》《大公报》写稿。1935年初，他成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至此开始新闻职业生涯。

非凡胆识 成就《中国的西北角》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了震撼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那就是气壮山河的史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1935年5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非凡的胆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追踪报道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他不遗余力，历尽艰辛，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访的历程。

1935年的中国，风雨如磐，时局动荡，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当时的西北，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人民生活极其贫困。范长江凭着坚韧的毅力，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踏上了西去的路途。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西北考察。他从上

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7月14日离开成都，经江油、平武、松潘到达甘肃境内西固、岷县等地，再到兰州。尔后继续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五原、包头等地。

从成都出发到江油的那天，正下着小雨，一路泥泞，车时而陷入泥坑，时而东拐西歪，坐在车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有翻车的危险。离开江油北行五里便进入山地，全是小路，汽车无法行驶，只好步行。一路所见，饿殍当道，遍地尸横无人掩埋。范长江描述道：因土豪劣绅盘剥，军阀连年战争，搜刮民脂民膏，“农村已经破坏了，家庭衣食全无着落，然而又要尽义务去修碉堡，……其死于途途者，尤比比皆是。……记者亲见盲眼老者，跛脚木匠，皆被派当夫。道路上呻吟叹息之声，不绝于耳。”在平武去松潘的途中，他头戴南洋太阳帽，身着军装、马裤、马靴，左肩斜跨干粮，右肩斜跨子弹带，腰间系文件包，在崇山峻岭中跋涉。他夜宿虎豹区，翻越大雪山，进入语言不通的藏族聚居深山密林区，穿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他在描述路途艰辛时写到：“溯岸北上，路尽在悬崖上，马不能行，一步一须小心，适可得过。愈走愈高，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其东连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周十数里，高耸天际，四面皆绝境，除二

小径外，绝无路可登。”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踽踽独行，经过50日的长途跋涉，方到兰州，行程3000余里。

从西宁去张掖，范长江与两名向导和从者，带着粮食、火柴、盐、醋等生活用品，骑马向祁连山南行进。渴了，喝祁连山雪水，困了，在马背上度过。为了沿途作细致的考察，从张掖到敦煌，范长江放弃乘车，仍然骑马，穿过“茫茫戈壁、泥泞草滩”，冒着漫天风雪，豪情满怀，策马在雪域高原，向着离太阳更近、离光明更近的地方迈进。

从兰州到宁夏，一路兵荒马乱，匪患严重。甘、宁两省交界的黑山峡，“过去数年皆为土匪散兵盘踞之地，下水皮筏十九皆被洗劫，甚至伤害旅客生命”，范长江坐在牛皮筏上，穿越激流的黄河水，越过乱石险滩，六七天的惊险船行，给他惊心动魄的旅程又增添了传奇的色彩。

这次西部之行，历时十个月，行程万余里，北至包头，西达敦煌，跋涉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等广大地区。这期间，范长江以其卓越的见识，博学的才华，凭着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翻雪山，临沼泽，越过祁连山，绕贺兰山，风餐露宿，一路去了解红军，报道红军，同时记录了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他沿途采写的旅行通讯，第一次及时、真实、公正、客观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文中对中共的军队，

不称“匪”，而直称“红军”，对国民党的围剿二字打了引号，以代表他对国民党“剿匪”政策的反对，表示他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

他写红军的《岷山南北军事之现实》《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等两万多字的报道陆续刊登在《大公报》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震惊全国。不久，范长江西行的有关通讯被《大公报》汇集出版为一书，数月内连印九次，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震。至此，范长江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

1936年8月，长江又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古西部，往返两个多月，考察被日寇覬觐的这一地区的实况，写出通讯《忆西蒙》。10月，绥远抗战期间，他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在抗日前线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敏锐地抓住这一事关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绥远前线飞往兰州，迅即奔赴西安，进入事变中心采访。在西安，周恩来欣然接受了他的采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接着，他又进入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了解十年内战的经过，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为第一个采访“红都”延安的记者，范长江“茅塞顿开”，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1937年2月15日，在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在《大公报》上发表



范长江

了震动朝野的政论，第一个揭示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之后接连发表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系列通讯，并将这些通讯和其他通讯汇集成一书，畅销全国，成为三十年代著名的新闻通讯，西安、陕北之行，使长江找到了真理，思想发生了决定性转变，他于1939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进步记者成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此后，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办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华商报》，在新四军军部创办中共华中书局机关报《新华报》和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先后担任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1946年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任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1947年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队长。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委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红色种子，情系祖国故园

1950年起，范长江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1952年4月，调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热爱并倾注心血的新闻战线。1954年，范长江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范长江是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1年，范长江患病，中央批准他休假一年，他借此机会回到阔别20多年的内江，探望父老乡亲，同时了解故乡人民的生活状况。

在故乡田家场，他召开了有区、公社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听他们谈农村的情况，又看了公社食堂。当时由于严重缺粮，乡亲们的生活相当困难，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他鼓励乡亲们，多想办法，努力生产，相信困难会很快过去。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胸怀的是故国家园之情，他如一颗种子，革命把他播到哪里，他就会把那里作为自己的故乡，情眷那块土地，将热血洒向那块土地，全心全意回馈那里的父老乡亲。

1963年，范长江带领国家科委和科协共99人到浙江诸暨县搞“四清”运动。当时诸暨县公路少，农村多未通电，他

昼行田野，晚宿农舍，几乎走遍了诸暨县的高山低谷、穷乡僻壤。虽是搞运动，但在诸暨的生活中，他熟悉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爱上了这里淳朴的民风民俗，把科学知识传授农民，让诸暨县走出一条富裕的路子。1965年8月，范长江奉令调离诸暨县，他回望这里的生活，几分眷恋，几分不舍，赋诗一首：

诸暨处处可为家，
高山低湖富无涯。
稻产千斤才及半，
猪户五头不为奢。
七分山地多童秃，
万片水田少鱼虾。
再得经营五十载，
绿水青山绕万家。

诗末题词：“诸暨已成为我的第一故乡，愿诸暨成为南方兴国县。”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范长江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追求真理，关心民生，提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的“民本新闻观”。他纪念鲁迅的诗句“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也是一份自我写照。他实事求是，生活简朴，敢为人民鼓与呼的崇高品质永远激励我们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内江市东兴区党史研究室)

也说“书画之乡”——内江

□ 魏 东



内江素有“书画之乡”之称。那么这称号到底出于何时，因何缘故呢？

一说：明代赵大洲主阁之后，有“赵内江”之称，“书画之乡”其名渐著。

二说：民国三十年初《大公报》一记者在该报发表文章，介绍内江书画，称内江为“书画之乡”，从此得名。当时，被誉为书画之乡的在全国只有两地，除内江之外，还有广东省海丰县。

三说：民国二十年三十年间，张大千、张善子的画已闻名国内外，因他们都是内江人，故内江得“书画之乡”之称。

不管其名由何而来，说内

江是“书画之乡”，确实当之无愧。

从古到今，书画之风在内江很盛。朋友之间，红白喜事，分离重逢，常以书画为馈赠礼品；旅馆商店，茶楼酒肆，剧场影院之地，皆要挂上名人书画，以示高雅；新建店堂，无不以名人字画对联为招牌，以招揽顾客。“芝兰室”茶馆和“小米家”“丹青饮”裱糊坊，以书画会友。著名国画家丰子恺和当时被称为“东方书法家”的于右任都在“丹青饮”活动过。

书法名人名作，大有人在

唐开元元年，内江人范金卿中状元。他是书法一流者，曾在花萼山江岩题“汇澜有裴”

四字。当朝大诗人李白曾有诗刊赠范金卿“范宰不买名，弦歌对前楹。为邦默自化，日觉冰壶清。百里鸡犬静，庐舍机杼鸣。逢人少荡析，爱客多逢迎。游子睹佳政，因之听颂声。”

明代，内江人赵大洲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书法诗文名冠当朝。因被权奸严嵩之徒陷害，两次回乡，讲学于桂湖，在各寺庙石壁题字颇多，在桂湖题有“龙庄瑶函”，在西林寺照壁刻有“狂草长歌”，在报恩寺内摩岩，城山寺亦有题咏、诗碑，其体在怀素祝允明之间，如奔云惊电，多中锋，上溯颜真卿。

明内江进士张应登、龚懋贤、王三锡、刘翹、陈禔也是有名的书法家，分别在报恩寺、葛仙寺坊、般若寺灵芝岩、西林寺、广化寺等地有题字。

内江绘画以杨所修得名较早。杨所修，又号云笠翁，系明天启甲子科举人，善画竹。前后三杨，杨所修之子杨拭、杨楠、杨桐称前三杨，杨所修之孙杨化元、杨化贞、杨化光称后三杨，均于明末清初以书



画得名。杨所修墨竹上追元代梅道人（吴仲圭），近师同代徐文长、石涛，风姿潇洒，摇风筛月，寸纸争宝，有题竹诗曰：“一片青光拂碧云，满天秋濼有谁闻。小斋几日莓苔雨，径欲担锄移此君。”

清乾隆时代，内江人姜锡馥为一大书法家，在内江题字甚多。曾为太子师，入翰林院。书法之规矩准绳，常严厉批评太子，乾隆某次遇见曾为子袒护曰：“吾子学书有成与否，俱要当皇帝。”姜当面忤龙颜曰：“如学书有成，可为尧

舜之君，否则为桀纣之徒。”

内江诸古寺僧丈雪，书法流传海内，略近碑体，飘飘欲仙，不拘行格，如苏东坡挥毫，多创新意，内江各地寺庙多题匾刻石，其诗亦清、瘦、真、趣。八十四岁时题诗：“自来尘里住，家计逐年增。日煮三窠菜，时供一个僧。尘禅非所习，为活亦无能。只应随缘住，如何继祖灯。”为醉书。

清嘉庆内江进士王果为有名书法家，晚年自山东贬谪回乡，曾在故居一泗滩头筑一楼读书习字，因平生最仰慕苏东

坡，遂名楼曰：“东坡楼”，其书法从欧柳化出，颇近苏字而法度稍敛，气魄较小。市人多能记诵其诗联，曾在广化寺题“化洽龙沙”四字。

清代秀才余燮阳的书法在内江、重庆享有盛名。内江很多堂店的招牌都出自他手，如“小米家”“杏林春”“益州参茸号”。挂榜出“挹秀江濼”亦为他所书。在重庆写的字很多，牌坊、招牌、条幅、横推样样皆写。他的书法，早年研习隋碑、魏碑，后来主要得力王羲之的《兰亭序》，大小字俱佳，真、行、草皆妙。不论大小字均用悬肘法。

内江同福场人余切（即公孙长子），不仅是辛亥革命时有名的革命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写双钩飞白，其压线双钩堪称空前绝后，晚年在上海卖字为生，与张善子互唱互和，张善子绘画，公孙长子题字，名著上海。

此外，江维斗亦以书法驰名西乡，常书联于戏台，当时有口皆传。书法近柳，但骨少而筋多，近于颜体。举人刘太古，其书字体谨严，笔触稍纵逸，近柳而骨重，常为地方书牌坊。余如李挺芳、张鹄、刘景伯、曾庆昌亦为清代有名书法家，在内江各寺多有题联。

内江绘画，自清乾嘉以来，代有传人

梅春岩、梅雪舟，专画花

鸟，技法由瓯香馆邹一桂变化而出，赋色鲜丽古雅，气势雄伟，多作一丈以上大中堂，巨幅画为“凤集高梧”和“天寒有雀守梅花”，很得世人好评。侯野云之兰草，叶长花疏，笔触风姿绰约，市内亦得常见。曹固元之葡萄，原法徐渭，后人蒋南沙一途，神形俱备。杨建屏之荷花，清润有致，露挹晨霞，人称能品。邓碧苔之细竹、蒋花农之兰竹也很有名气。

民国时期，内江书画名家以张大千、张善子最为出类拔萃。张大千和张善子是弟兄，张善子排行第二，张大千排行第八。张大千之父生意破败后，靠收破烂和帮人挑水为生。其母以绣花为业，擅长于单线白描，画出来的花草虫鸟栩栩如生。张善子和张大千在绘画上的成就，母亲的影响很大。

张大千生于1899年5月10日，原名张正权，后改名张爰，季爰，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画室取名“大风堂”，曾旅居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后居台北市双溪“摩耶精舍”。1983年4月2日逝世，享年84岁。张大千是著名大画家，一生作画无数，不但在中国有极高的声望，而且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张善子生于1882年5月27日。本名张正兰，学名张泽，

字善子，因喜欢画虎，故号“虎痴”或曰“蜀人虎痴”。张善子以画人物、动物为主，间或也画山水，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就绝少山水画而专事画虎和其它动物，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他画的虎，色彩斑斓威武雄壮，逼真酷肖，活灵活现。有呲牙吞噬的，有怒吼长啸的，有利爪扑跃的，有威气慑人的；有残岩断壁上的虎，荒草密林中的虎，寒月清霜下的虎，跑着的虎，卧着的虎，蹲着的虎，飞着的虎，真是画尽了、画绝了。因此“虎痴”之号不胫而走，国人莫不称奇。



张善子作品

为画好虎他专门买了一只小虎喂养起来，细心观察。

1923年，张善子为四川阆中县锦屏山画了两只虎，分别刻在两个石碑上，一是上山虎，一是下山虎，题词：“虎视眈眈遍西东，河山瓜豆一望中。睡狮至今犹未醒，将来谁是主人翁”。取石碑名“虎碑”。《十二金钗图》是张善子的虎画杰作，把虎的神态、行态、性格、表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公展以后，获得空前成功，一时风靡全国。“七·七”芦沟桥事件暴发以后，张善子为祖国惨遭日寇践踏而痛心疾首。由沪返川途中，他在武汉买了一块长二丈、宽一丈二尺的白布，饱蘸颜料，挥笔画了二十八只猛虎，写了“怒吼吧中国！”几个大字，又在画的右下角题词：“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振河山势吞小丑。”这幅画从武汉画到宜昌，花了四个多月时间。他指着这幅画对人说：“你们看，中国二十八个省都怒吼，小日本焉有不败之理！”

1938年8月13日，是上海“八·一三”事件一周年，张善子特画了一幅《中国怒吼了》的画为纪念。画面上，一只硕大无比的巨狮鬃须怒张，双目如炬，引颈长啸，如柱的四只脚踏在富士山上，压得富士山崩土溃。

1938年底，在中共周恩来

同志和国民党政府林森、赈济委员会许世英等人的赞助下，张善子带上他本人和张大千以及他们合作的作品180多件，出国办画展。1939年3月，“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画展”在法国贡格尔德堡正式开展，吸引了成千上万观众。当时的法国总统勒白朗也亲往参观，并称赞张善子兄弟的画是“东方近代艺术代表”。

以后，他又到美国，在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波士顿举办画展，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举办画展百余次。并到一些大学和团体进行演讲，宣传抗日，有时还挥笔作画。曾画虎赠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先生。这些画后来都被收入美国国家博物馆，至今被视为珍品。

著名画家罗志君，比张大千早18年，善长工笔画，画仕女图、百蝶图，最有名的是“白公鸡图”。当时闻名全国的幽默大师，内江人刘师亮在成都总府街昌福馆内开设双龙茶铺和双龙池澡堂，罗志君就在那里卖画，每幅4元，而在北京每幅却卖10元。成都每年赶花会的时候，前往双龙池观画、买画的人络绎不绝，挤断交通。他的两个女儿也学父亲，工笔专画仕女，在成都也小有名气。

邱特澄，字永培、别号柳湾渔人，世居内江县田家乡。

他幼年读书，即喜爱翰墨，后向资中著名画师杨春梯登门求教，主攻写意水墨山水画，尽得真传，因其秉性豁达恬静，所作之画，极似倪云林“天真幽淡”的气韵。1932年，在为人作长幅山水横推题句云：“茫茫大地苦烟尘，何处能安自在身。画里溪山无限好，偏舟稳坐钓鱼人。”当可见其清逸的情怀。邱虽秉承师教，宗法古人，但不为古人所囿，而能直追前人画意，熔金陵八家、常州画派、米点山水等各家笔法于一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赢得江城“邱派”之誉。

官寒枝，又名硕华，画名瞎耳，生于清末，卒于新中国建立前夕，内江县东兴镇人。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期间，曾任内江县清乡司令部顾问，继任自贡盐场知事，受聘于重庆“陶专”（重庆美术学院前身）任美术教师，擅长绘画花卉翎毛，尤以走兽著称。曾有边防军参谋长李剑民，驻防内江时，一日，横渡沱江往东兴镇华屏祠访官，不遇。见画案上一幅狗画，乃即兴题诗云：“无事满街走，过河访画友。见画不见人，画中狮子狗。黑白分浓淡，笔笔精神有。我愿向你学，不知能传否？”他画之狗，形神兼备，故有“官狗儿”之称。青年时，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同案作画，为至交画

友。

陈石渔及其女儿陈克正、陈克贤，其子陈靖芳，皆善于绘仕女，以古装仕女为长，在成都颇有盛名。

刘采臣善画草虫，以蝴蝶最佳，栩栩如生。

另外，叶青的花鸟画，特别是荷花和菊花，罗梦渔的菊花，张敏文的兰草也很有名气。著名画家周润秋虽不是内江人，但其爱人是内江人，亦长住内江。曾留学比利时，画西画，成为内江一个独立的画派。

解放后，内江——“书画之乡”的盛名不但得以继承，而且更加发扬光大。先后造就了一支又一支专业和业余美术书法队伍，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美术书法人才，其作品在参加国家和省级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中屡获佳奖。特别值得内江人骄傲的是内江人氏晏济元、邱笑秋等国画大师，他们的作品，不但在省内，而且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享有很高的盛誉，晏、邱二人在《内江市市中区志》均有专著，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总之，“书画之乡”——内江，当之无愧，名不虚传。

（作者单位：内江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

三里一糖坊

五里一漏棚

——小记内江糖坊

□ 向思宇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个种植甘蔗的国家之一（其余两个国家一是印度，一是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早在东汉末年以前，中国就有了野生甘蔗，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广西、云南、福建、四川、江西、湖南、浙江、贵州等省（区）。除台湾省外，四川植蔗的历史最为悠久，面积相对较大。内江则是四川省内种植甘蔗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最负盛名。南宋（1127—1279）遂宁人王灼著《糖霜谱》，记述了四川遂宁、广汉、内江等五郡产冰糖，以遂宁为冠，如琥珀

珍玉。明清以后，以遂宁为主的涪江流域蔗区逐步向气候、雨量、交通更优的内江、资中为主的沱江流域转移。资州县志记：“资中土多田少，清咸同年间（1851—1862），多种罌粟，嗣以禁例，改种甘蔗、番薯及各种杂粮。”

近代，内江的甘蔗和糖业一度成为其经济支柱，食糖、冰糖、蜜饯成为对外交换的主要产品。辛亥年（1911），内江县的甘蔗种植面积为全县耕地的50%左右。资中、资阳、简阳三县在沱江两岸三十华里以内，甘蔗种植面积高达耕地面积的70%—80%。糖坊、漏棚星罗棋布，内江县的糖房、漏棚达3000多家。糖房规模扩大，制糖技术迅速提高，开始用石碾压榨取代木碾压榨，动力用人推改为牛拉。当时四川产糖量的70%集中在内江，内江产糖量占全国的50%以上。民国三年据农商部

调查：全国产糖180万担，产糖最丰者，首推四川内江。民国初年，内江县的甘蔗面积、产量位居全省近50个植蔗县之首，资中第二。民国二十六年（1937）《中国糖业》月刊调查估计，内江地区产糖约占全川的68%，占全国产糖的18.7%—26.6%。桔糖和冰糖产量几乎独揽全川。内江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川糖业中心，“甜城”美誉由此而来。

内江曾经是西南最大的甘蔗生产中心，支柱产业蔗糖在相当程度上给内江赢得过内老三（内江经济仅次于成都、重庆）的称誉。内江发达的制糖工业带动了造纸、化工、酒精、机械等产业的发展。史料载，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内江的糖产量和质量在全国、全省名列前茅，当时全国年产糖34万吨，内江产糖8.7万吨，占全国的25%，占四川的55%。从清末到50年代初，内江的糖制品通过糖业贸易网络，销售到青海、西藏、云南、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东、甘肃、陕西乃至新

疆等地，年销售量达5.5万吨。1936年全国产糖34万吨，其中四川产糖10万吨，占全国的29.4%，内江产糖8.7万吨，占全国的25.6%，占四川的54.9%。50年代初，内江蔗糖量占全省产糖量的54.9%；1955年占四川的63%。我国著名甘蔗学家陈让卿教授1938年在为《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一书所写的“弁言”中指出：“欲振兴中国糖业必须振兴四川内江糖业”，可见，内江糖业在全国蔗糖生产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蜿蜒峻美的沱江，将内江一分为二，江的右边叫城，江的左边叫乡。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内江城很小，街道只有大西街、小西街和南街子；楼房建筑仅有苏联人设计的有着四根圆形柱子的人民电影院，以及位于中央路的中国银行办公楼等少数几幢。城区内没有公交车，少量的人力三轮（俗称黄包车），不算多的步行人流，舒缓的生活节奏亦如将城区环抱着慢慢流向长江的沱江。乡下人进城走亲戚，挑几样时鲜蔬菜，或几斤新米之类，殷实点的人家拎上一只鸡，几天后返乡，手头必拎着城里亲戚送的“煮货”（蜜钱）。

相对狭窄冷清的城，乡的地盘更大更宽些，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乡”是支撑“城”的主要支柱，其中一个



曾达一墓碑

重要原因就是乡里种植着大面积的甘蔗，以及遍布乡下的糖坊和漏棚。

内江人熟知内江糖坊起源于梁家坝，而且曾氏家族以经营糖坊致富，成为内江巨室。曾氏以降，在内江经营糖坊较早的还有白马庙钟氏。白马庙《钟氏族谱》记其来川始祖钟荣普于乾隆年间由广东迁川，后来开设糖坊事。

从曾达一引种甘蔗入川到钟荣普开设糖坊历40年，拥有种蔗制糖技术为致富门径的经营之道迅速传播开来。

到了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内江糖业发展已很是可观。

内江郭北乡《王氏族谱》记其家族在乾隆时期经营糖业的情况有云：“南州公，讳杭，宗海第三子，茂才纯斋弟也。为人诚笃，局量宏敬。年弱冠，

奋然以成家立业为己任：力穡务农，垦土执蔗，建糖局造糖霜，利常三倍，渐臻裕大丰亨。宗海二老顾而乐之。”像郭北王氏这种靠甘蔗制糖致富的事例在当时的内江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清道光十四年(1834)，嘉庆时进士，曾任知府的王果私人修纂了县志《内江县志要》，其中对嘉庆年内江的种蔗制糖盛况作了详尽描述：“中川当蜀省东西之交，南北接壤，江流萦带，地气中和，故蔗物蔗生；……沿江左右，自西徂东，尤以执蔗为务。平日，众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长喙短锹，几于刊山湮谷。入冬辘轳煎煮，昼夜轮更。其壅资工值十倍。……通鬻远迹，利常倍称。”绿油油的蔗地，布满田间地头的耕耘者——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风景画！在这

里，早先单家独户的种植方式已发展成集约化生产趋势。再看榨季时糖坊开搞的情景：“辘轳煎煮，昼夜轮更”。“辘轳”是榨蔗用的辘子（辘子有石辘、木辘）。如是石辘，多用牛拉，驾牛只数，看石辘大小而定，少则二头，多则四头。“昼夜轮更”是说糖坊收购甘蔗后，为了减少糖分昼夜轮番地榨蔗的情景。

这种景象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初期。

梁家坝曾达一后人曾维纲讲述祖辈在“用千担做木轴压蔗”的过程中开始出现把制糖从家庭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实行季节性专业生产——糖坊由此应运而生。最初出现的这种规模小，无需大资金投入的家庭式糖坊数量很多，故有“三里一糖坊（榨蔗、熬糖），五里一漏棚（加工白糖的作坊）”的说法。

糖坊一开搞（开始榨糖），糖坊的工人便三班轮流。这些工人叫青山丈，俗称叫刀班，专门负责砍甘蔗，一个刀班16人，包括一个牛毛匠，一个种子匠。牛毛匠是担“牛毛”的（甘蔗上的毛叶俗称牛毛），专门负责砍甘蔗上的毛叶。刀班匠把甘蔗尖子削下后，牛毛匠就去把尖子捆起来，将砍下的叶子和嫩尖担到糖坊里喂牛。等地里的甘蔗运完后，种子匠就去把种子（砍下的甘蔗尖

子）窖好。整个刀班中，数刀班匠干活最是威风。十几个刀班赶到主人家地头，将背上的杓杈（通常叫马马肩）往地上一放，二话不说，从腰杆上抽出锋利的弯刀，将一根根甘蔗扳弯，刷刷地将其“斩首”。等牛毛匠去捆尖子时，他们取下叉在杓杈上的4尺长短柄锄头，对准甘蔗老莖，一锄下去，连根带泥就是一根。之后，把甘蔗蓬起来，左一刀，右一刀，最多3刀就把蔗秆剔干净。剔好一堆捆一堆，每捆约120斤。之后，刀班匠用杓杈倒叉在一捆甘蔗上（一捆捆甘蔗早已横担在一条条地沟上），再将杓杈左右两头重量挪平衡后，连杈带蔗抬起，担上肩，左右手分别抓住两“脚杆”，挑起就跑。

甘蔗砍下来，送进糖坊开搞之前要搞一个祀神仪式。先由道士祭辘子，敬鲁班，祭山神土地、地脉龙神。用手蘸公鸡冠血、撕鸡毛贴到“辘子”“头巾”“将军柱”和糖灶灶门上，祈求百事顺遂。然后“封海水”（又名“收火星”），用一个土陶的长颈小口罐，内装盐、茶、米、豆。道士燃烧香蜡纸钱，手执“令牌”，口里念咒语画符令，用青白布盖在罐口上，再用青白线各七根拴紧，用其令牌在盖布上面画符咒，用手挽结；最后用方形印鉴印在白布上，同时点上雄鸡

血，贴上鸡毛，倒挂在糖坊大门口的门额上，以示小心火烛，安全生产。

祀神仪式做完，开始喝起搞酒，谓之吃九斗碗。九斗碗，即一桌九个凉菜，外加九个热菜（即蒸、炒、肉汤）。吃起搞酒一般坐十来桌，每桌8人。主要请两类人，一是青山户（即蔗农）、租牛户和糖坊工人，还有亲友；二是地方保甲长、袍哥等社会名流，这类人通常都是请他的一家子。青山户、租牛户、糖坊工人及老板的亲友坐一桌，地方社会名流坐另一桌。请青山户、租牛户和糖坊工人及亲友吃起搞酒，是犒劳他们种植甘蔗和榨甘蔗付出的劳动，也是为了安顿这些人的小孩以免他们去甘蔗地头拖甘蔗。

吃起搞酒不仅坐座位讲究（年纪大、德高望重者坐上席），吃法也讲究，威望高、地位高者动筷子后，大家才能依着次序，轮流谦菜。谦的菜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你尽可以将谦的菜用青菜叶包起来，带回家给妻儿老小吃。当然，有身份的人是不会带的。

起搞酒开吃前，个别糖坊老板要采用拈阄的方式来决定青山户甘蔗割交的先后次序。但绝大多数割交甘蔗的顺序通常是由糖坊老板指定刀把（即工头）定。可别小看了这先后顺序，这先砍后砍可大不一样

哩。谁家甘蔗砍得早，水分就够，斤两就足；其次就赢得了安排下次种蔗的时间；第三还可以先结账。甘蔗砍晚了不但水分少，含糖量低，斤两也相应差些。每年冬月，与其说是蔗农的丰收季节，倒不如说是糖房老板的欢春节。有这样一副糖坊联：青山苦咽起搞酒；老板欢榨骑年红。

可见，这看似热闹的起搞酒背后分明是糖坊老板煞费苦心的算计：首先是吊甘蔗的秤，那是特制的“糖帮秤”，每斤要多二两五钱，吊一百斤要另敷（敷，去皮的意思）泥水十斤或二十斤。有时甘蔗尖子下嫩了，或者莧子没有修干净，还要另议敷秤。还有，掌秤杆的刀把另有一套过秤技术，你若对他不是格外殷勤，他可在秤杆上要你一手，使你吃亏说不出来。再有，蔗价总是议得很低，付款又总是延期，最后扣除预付款及利息和歉收的长支。

何谓“骑年红”？糖坊因蔗源多，头年榨不完，跨年生产的叫骑年搞，喜称“骑年红”。老板倒是“骑年红”了，蔗农可就苦了，因甘蔗砍在最后，错过了来年下种，蔗农被迫穿林（剪去蔗叶）种小春从而影响产量。

榨甘蔗的地方叫八角亭，亭内安装搞盘全套设备（八角亭和搞盘，就是后来机械化糖

厂的榨蔗车间）：用竖式环行，用牛力拉挽的石质公母辊子（即主动辊和从动辊）榨蔗。这种榨蔗设备有三个部分：动力部分、传动部分和工作机部分。动力石辊是用牛来拉挽的，用牛多少及编排组织，随石辊的大小而定。传动的犁轘（单犁轘）一般由三头牛并行拉动。走圈内者为“内牛”，居中者为“中牛”，走外圈的为“边牛”。放置榨蔗设备和榨蔗工人操作的地方，称“搞盘”。搞盘周围为“牛道”，即榨蔗工区。

红糖的煮糖过程先由“泡师”将“地黄缸”内的蔗汁，提倾“天盆”，笕入“头泡锅”，依次进入出糖锅。当“烧火匠”点燃火（叫架火），在蔗汁上灶（蔗汁只可进六成）时，不能掺满锅，待其蔗汁全部沸腾后，“泡师”将蔗汁内的黑泡沫（黑泡沫俗称“糖泡子”，既是喂猪的好饲料，又是制造“糖泡子酒”的主要原料）打去。一次又一次将黑色糖泡打尽后，按照锅位，依次进入煮锅。接近糖水煮成糊状液时，在煮糖锅、熬糖锅内，由“掌火师”领着三个匠师用“糖瓢”“摇瓢”：将糖瓢高高举起，让糖浆从瓢里倾回糖锅，如此反复多次。其间，熬糖匠用眼睛观察，凭经验看熬糖成熟与否。然后经过出糖锅，舀入“糖盆”散热，用糖耙推荡，

使其冷却，再用糖耙搅拌，见到糖液初凝时，“掌火师”将糖盆内的流体砂糖，放进“小糖桶”，再将桶内糖倒在事先放在平地上用篾片编成、内铺有草纸的筛圈里冷却，凝结成“筛子糖”。每个“筛子糖”约重50斤，再装进双耳木桶内，每桶可装八至九个“筛子糖”。装桶子糖前，先由“掌火师”将草筋纸壳（又叫表青纸）垫桶底和桶壁，再垫上二层草纸，谓之“打底糖”，火色要比“筛子糖”稍大些；之后是一层“陷糖”（也叫内层糖），放叠一个“筛子糖”，最后在面上加“盖面糖”。待全部冷却后，用草纸、表青纸封盖好，加盖上木板桶盖子，一桶净重500斤，谓之桶子糖。桶皮上写明糖坊本家名号，如“洪兴顺号”“九龙远号”，等等。糖桶耳朵上写明收糖人名号，如“张三记”“李四记”，等等。还有“篓子糖”，其装糖方法同桶子糖相同，只是装糖的家什是用竹篾编的篓子，每包“篓子糖”可装250斤。

在内江县，糖坊的分布主要分西区和东区两大块。史家乡、白马乡为西区，西区土地肥沃，种甘蔗多，糖坊也多——糖坊的多少是根据甘蔗分布情况来定的。西区一保（相当于现在的大队）至少有一个糖坊，好的保有两个糖坊。康姓“六吉堂”糖坊算得

上西区首屈一指的大户。“六吉堂”共有六所大糖坊，年榨蔗量在1400余万斤左右。康家糖坊不仅糖坊开得多，在金融界也颇有信誉，向银行贷款只要提“六吉堂”，不用物质抵押就能贷到款，称得上糖业界一块“金字招牌”。东区的高粱乡、田家乡、顺河乡、白合乡，由于土地贫瘠，主要产红苕，甘蔗种植少，糖坊相对就少。

当时稍微有点本钱的人都开糖坊。通过开糖坊，有的发了财，有的中了举人、进士。内江的许家乡开设糖坊，出过几个举人、进士。内江县松柏乡老糖坊张氏家族（今东兴区高桥镇老糖坊），俗称“般若寺张家”还同时出了四个县长和一个行政专员。

内江糖业，不只让开糖坊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内江糖业母厂银山糖厂专家楼



的人发了财，读书升了官，还养育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内江被称为书画之乡，远的不讲，近代就出过二张二余加一晏（二张即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善子。二余即书法家公孙长子和余燮阳。一晏即晏济元）。

据省食品工业科研所有关糖的调查资料统计，民国三十一年（1942），内江蔗区所属的六个县有糖厂8个、糖坊1347个、漏棚797个、糖坊兼漏棚961个、冰桔铺47个。四川省的半机械制糖厂全部在内江。

民国年间，稍有经济基础的内江人在本地开设糖坊已是司空见惯，但将糖坊、漏棚带出省外，外省由此而知道内江糖坊、漏棚的却鲜为少见。

世居内江县城的陈石渔，喜爱绘画外，热衷于办实业。

30多岁时，陈石渔离开家乡去了贵州。陈石渔在遵义卖画的同时，替当地官家开办过石印局、蚕桑局、陶瓷厂和火柴厂。在遵义期间，他发现当地人很喜欢糖，遵义却不产糖，所吃的糖大多是从内江经山路运去的，未运过去的红糖也特别稀奇，糖的价格比较昂贵。陈石渔琢磨：

在遵义开设一家像内江那样的糖房，生意肯定不错！遵义本地不大量生产甘蔗，但贵州山区与四川接壤，土质、气候相差不多，对蔗糖原料不妨进行移栽试种。这样本地能产糖了，运费也减少了，糖的价格也就便宜了。消费糖的人方便，生产糖的人也有利可图，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于是他筹齐资金，于1921年冬从遵义回到内江，约齐了过搞匠、熬糖匠、白糖匠、刀把手、饭头（煮饭的），以至放牛老么等开办糖房的全班人马。

陈石渔在遵义那边经过大半年筹建，到了冬天，种放植的甘蔗成熟了，糖坊便正式“开榨”了！“开榨”第一天，远近赶来参观的人群将糖坊围了个密密匝匝。这些人看啊，问啊地没个消停。大家伙说得最多的便是：我们遵义也有糖坊了！我们也可以就近买到内江的糖吃了！很快，红糖生产出来了，白糖也生产出来了，红糖还用“模子”浇铸成椭圆形的红糖饼，糖饼上盖着“肇新糖坊”标记。“肇新糖坊”糖随即成为当地人赠送亲友的珍贵礼品。

内江人在遵义开办糖坊的事，一时在当地成为轰动性新闻。

（作者单位：内江市东兴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从毛泽东长征诗词中品读中国精神

□ 罗 雄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用生动形象的诗词语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演讲，对长征作了精辟总结：“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我们领会到了长征的真正意义，这就是我们要大力弘扬的长征精神。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阅读《毛泽东诗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对长征精神理解更加深刻。

快马加鞭未下鞍

——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

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浪。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十六字令·三首》描写的是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越过江西境内雷岭，广东境内苗山、大王山、小王山、大盈山；12月越过广西境内猛虎岗、花林隘口；1935年6-8月越过四川境内大相岭、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六盘山的情形。因为中央苏区地处闽赣边界，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起步时的路线群山起伏、山势险峻、环境恶劣，作者借用熟悉的：“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湖南民谣，形容长征路程的艰险。毛泽东笔下的山，既是有形的山、也是无形的山、更是必须跨越的困难之山，山之“高”、山之“险”、山之“奇”尽在诗中，让人望而却步、望而生畏。但再高的山、再陡的岭、再险的路、再恶劣的条件，也阻挡不住红军前进的脚步，彰显了“山高人为峰”的英雄气概和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共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军委领导集体。面对高山峡谷，毛泽东诗兴大发，三首十六字令如一轮红日，在崇山峻岭之间喷薄而出、光芒四射，与红军的红星、红旗、红领章交相辉映，凝固成永远精彩的诗画意境和文化符号。

而今迈步从头越

——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是贵州省遵义县大娄山山脉中的最高山峰，是红军由川入黔的要隘。此处万峰插天，中通一线，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5年1月19日，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轻装上阵、机动作战，率部离开遵义至泗渡，20日经板桥翻越娄山关至桐梓，21日至九坝，26日抵土城。因为“左”倾路线的干扰，土城之战失利。毛泽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亲自指挥反围剿，反败为胜，创造了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

1935年1月29日，红军化被动为主动，一渡赤水之后进入四川南部，拟于川南横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封锁长江，毛泽东当机立断率军回师贵州，再取遵义。2月3日抵达四川叙永县石厢子，5日至川、黔、滇边界的鸡鸣三省之地，6日至云南威信县石坎子，9日到达扎西镇，18日到达走马坝；18-21日，中央红军避实击虚，由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渡二渡赤水。1月23日毛泽东到达后滩坝，25日挥师娄山关。红军经娄山关北上，准备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突遇国民党重兵把守，只好原路返回遵义，在途中经过半天激战，打败扼守娄山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一个师，俘敌3千人，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鼓舞了红军士气，再次占领遵义城。

《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写的就是娄山关战役，可谓悲壮苍凉，声情激越，意象精美，语言凝炼，气势非凡。前阙描写拂晓时红军向娄山关进军“迎来日出”的黎明场景；后阙描写红军攻占和越过娄山关天险时，太阳即将落山，“送走晚霞”的夕阳画面，抒发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艰难处境和“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定信念。

万水千山只等闲

——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长征历时两年，途经11个省，越过18座高山，横渡24条河流，歼灭击溃敌军400多个团。经过一次又一次生死考验，行军总里程达二万五千里，在神州大地播撒了革命的燎原火种。《七律·长征》是记录长征艰难、庆贺长征胜利、抒发革命豪情的扛鼎之作，也是毛泽东写作的第一首“七律”诗，堪称中华诗词典范。

“五岭逶迤腾细浪”指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的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江西瑞金出发长征，沿着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边境蜿蜒曲折的五岭山道艰难攀登，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向西进军。险象环生的五岭，在红军战士眼中，只不过是平静的水面上泛起的细小波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指乌

蒙山绵延在贵州、云南两省之间，尽管险峰高耸云天，让人望而却步，但在红军战士看来，也只是茫茫原野上滚动着的渺小泥丸而已。“金沙水拍云崖暖”指长江上游自青海玉树到四川宜宾之间的金沙江，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云崖暖”指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云南省禄劝县西北的绞车渡渡过金沙江的时候，正值春暖花开、柳暗花明的阳春时节。“大渡桥横铁索寒”指源出青海、四川两省交界处果洛山的大渡河，两岸崇山峻岭，水流陡急，瀑布高悬，曲曲折折地从险峰峡谷之间流向四川乐山汇入岷江。“桥横”指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在四川省泸定县境内，地势险要，桥长约30丈左右，用13根铁索组成，上铺厚实的木板作桥面。1935年5月，中央红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木板全部被国民党军拆除，切断了红军的去路。红军先头部队英雄战士冒着对岸敌人猛烈的炮火攀缘过桥，用鲜血和生命重新铺设大渡桥，使大部队顺利过江、走向坦途。“岷山”指绵延于四川、甘肃两省边境的南支和北支山脉，有几十座海拔超过4500米、山顶终年积雪不化、高耸云天的雪山。“三军”指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

因为红军有“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积极向上乐观精神，才有长征“三军过后尽开颜”



的旷世奇迹。

安得倚天抽宝剑

——敢于碰硬的亮剑精神

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35年6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梦笔山等大雪山。据毛泽东原注：“前人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

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他后来又自注：“宋人咏雪诗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昆仑各脉之雪，积世不灭，登高远望，白龙万千，纵横飞舞，并非败鳞残甲。夏日部分消融，危害中国，好看不好吃，试为评之。”“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念奴娇·昆仑》一词，情系华夏，思接古今，立足昆仑，放眼世界，是难得的诗词佳作。

“安得倚天抽宝剑”一句，既是对红军的自信，也是对民族的自信，更是对自我的自

信；既是对困难的藐视，也是对追兵的藐视，更是对帝国主义的藐视；同时也充满对“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美好期待。面对困难从不低头、面对强敌敢于亮剑、面对挑衅敢于说不，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与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脉相承。

不到长城非好汉

——坚定不移的执着精神

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过岷山后，进入甘肃南部。9月18日，毛泽东到达甘南哈达铺时，他从一张废弃的旧报纸上获悉，陕北仍保存有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队伍并建立了根据地，立即在定西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地区。会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北上，10月初突破国民党部队在六盘山一带设置的封锁线。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固原县青石嘴时，发现一股

尾随而来的敌骑兵正在当地村庄歇息，决定立即围歼。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歼灭敌骑兵两个连，缴获敌战马百余匹，使蒋介石堵截红军北上的计谋彻底破产。当日下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在经过半山腰一道山卡时，转身挥手招呼行进中的部队：“同志们休息一下！”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左手取下军帽，右手搭起凉棚眺望远方，大声即兴吟唱起了《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呼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长征谣》即《清平乐·六盘山》初稿。毛泽东作诗填词长于借景抒情，视野开阔，画面宏大，意境优美，感情浓郁，情景交融，该词是一首代表作，具有以景抒情、以情表意、以意成象的典型性。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以文化人的人文精神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35年10月，彭德怀从二、三纵队驻地到吴起镇与毛泽东商议红军行动计划时忽得急报，一路尾随而来的马家军——马鸿宾、马鸿逵部和东北军的一支骑兵进犯红军驻地。毛泽东发话：“我们要打退敌人，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指战员奋起出击，首先将马家军35师骑兵团打得落花流水，随后将东北军白凤翔来犯的骑兵团打得溃不成军。彭德怀得胜回营，见到毛泽东手书六言诗，阅后遂将“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退给毛泽东。毛泽东显然在借《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赞誉彭德怀的英雄气概。

此诗以豪迈欢快的笔调，勾勒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击溃马家军骑兵部队的战斗场景，刻画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勇敢善战的气势与魄力。此诗既表达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战友情怀，又表彰了彭德怀的卓越战功，更展示了毛泽东以诗传情、以墨赠友、以文化人的人文精神。

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文化遗产和红色基因，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勇往直前、克敌制胜的精神动力，值得好好品味和吸收。

（作者系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局长）

一个大巴山区折射的历史光辉，84年过去，依然焕发异彩

巴山红 最忆是通江

□ 伍松乔

套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的话，84年前，1932年12月18日的通江县两河口镇，越秦岭、翻巴山从天而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声枪响，为四川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一大苏区。红军入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建立起广阔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两年半里，枪林弹雨，天翻地覆。风卷红旗如画，撼动全川，震惊中华。

红色首府缘分，造就罕见革命胜地景观

川陕苏区极盛时期，红军从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达到5个军8万多人。区域发展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控营山、渠县，北据陕南镇巴、西乡、宁强，面积4.2万平方公里，约700万人，纵横24个县市，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二大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上，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其中，通江的显著，在于它举足轻重、引领全局的首府和大本营地位，以及由此承载的特殊奉献与巨大牺牲。

1932年岁末大巴山的寒冷，不敌两河口冬天里的一把火。赤焰所及，在“干柴”遍

地（穷困已极且富有反抗传统）的巴山地区顿成燎原之势。

红军的步伐快得惊人：12月18日入通江，25日克县城，26日总部各机关即入驻，29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城宣告成立，同日，川陕苏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共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进驻，并颁发了第一张布告。新年伊始，1933年2月7日，川陕省委

第一次党代会在县城召开，2月17日，又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党、政、军首脑机关及相继设立的总经理部、保卫局、法庭、财经委、税务总局、工农银行总行、省委党校、兵工厂、总医院、石印局、总工会、戒烟总局、少共省委、反帝拥苏大同盟等完整机构，总体上均长驻通江，通江由此成为川陕苏区的首府与大本营。军事、政治、经济的重大部署与战略指令，皆从这里发出。

通江县城文庙背后，由红军创建并命名的列宁公园，历经风雨，至今依然郁郁葱葱，园内一座民国初年的西式小楼



列宁公园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

“五一村”，是川陕苏区最高领导人、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的住地，也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总参谋长曾中生、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省临时革委主席邝继勋、省委书记袁克服、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等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

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王树声大将等446名将军，也曾在这通江境内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留下了大批革命遗迹和珍贵文物。通江本土，也涌现了10名将军。

在通江，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旧址。该旧址系明代文庙建筑，占地2460平方米，1982年辟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军史陈列馆”，馆内收藏着2000多件红军留下的珍贵文物。1992年更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2005年重新布展后对外开放。胡耀邦总书记、江泽民总书记曾先后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江各地还保存着1300多幅红军时代的石刻标语，其中，“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闻名遐迩，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赤化全川”位于通江沙溪镇左侧红云岩上，岩顶部所刻“赤化全川”四个大字，字迹工整，笔力遒劲。由巴中恩阳河一张姓教师书写，鏿字队



“赤化全川”石刻标语

用了4个月才刻成。每字26平方米，字高5.5米，宽4.7米，笔划深0.35米，宽0.7米，笔画槽里可躺卧一人，字间距为7.1米。红云岩雄据万谷之巅，离岩三、四十里远，标语字迹也清晰可见。由于岩高字大，红军北上后，字迹仍难被毁去，长存至今，一如当年。

通江保存着的数百幅红军壁书墨迹中，以太平乡壁书文献规模最大。这幅壁书写在居民住房的墙壁上，整整占据了26栋墙壁，近120平方米，全文记载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颁布的《劳动法令》《土地法令》和《十大政纲》三个重要文献。

在通江，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红军烈士原葬陵园——王坪烈士陵园。园内安葬着7800多名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烈士墓碑题词和图案是

当时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亲自书画的。正面题词是“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两边的对联写着“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碑顶刻有镰刀斧头图案，碑座则有长枪、短枪浮雕。

“川陕”首府、红军之乡的红色氛围，在通江真是“浓得化不开”，别有一番直击人们心灵的震撼力。

可歌可泣之“歌”：奠基“第二大苏区”

在通江红土地上踏访、探寻，尤如展长卷，读异书，不尽奇观接踵而至，波澜壮阔。见闻感受，用“可歌可泣”方能表达。

红四方面军与通江人民的交融，铸成了“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发抖”（毛泽东语）的中国“第二大苏区”的坚强基石；川陕苏区烽火历程，孕育出“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即1934年11月通江毛浴坝会议制定的红四方面军16字训词）。感天动地之功，尽在其间。

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便造就出如此众多的丰功伟绩，让人惊讶。今天看来，其可圈可点之处，仍比比皆是，精彩纷呈。

择要而言。

“川陕苏区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徐向前语），红军在通

江打了上百场仗，共歼敌6万余人，最有名、最关键的一仗是空山坝战役。1933年初，刚满一岁的川陕苏区以1.5万兵力，应对6万川军田颂尧来犯之敌的三路大围攻，用“收紧阵地”的办法（与中央红军“诱敌深入”齐名），最后将敌诱入空山坝，分割奇袭，3昼夜激战，全歼敌人7个团，打垮6个团，歼敌4千余人，俘战5千多，由此扭转全局，成为红军战史的光辉篇章。

此外，不战而去人之兵，则以长期以来未受到研究者重视的红四方面军与陕西杨虎城十七路军订立巴山秘密协定为典范。红军充分把握抗日形势的变化，与对方在通江至汉中之间穿梭往返，终于达成互不侵犯及默契反蒋的协定。这一着非同小可，它使得大巴山500里战线长期无战事，让川陕苏区不致腹背受敌。通江与汉中之间还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情报、物资、人员的通达，对红军更如雪中送炭。

战事频繁之际，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工农青妇少群众运动及工商文教诸多社会发展事业居然也有条不紊、迅速铺开，建树良多，真是了不起。

据统计，当时在通江兴办的各类工厂达200多个，有兵工厂、造币厂、铸锅厂、铁厂、被服厂、纺纱厂、织布

厂、染布厂、斗笠厂、草鞋厂、盐厂、碗厂、酒厂、纽扣厂等等，最大的工厂有工人2000多人，全县工人总数达到3万多人。大文化方面，不但设立了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局、国家出版局等，还办有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川陕省工农总医院等医疗机构，建有列宁公园、红场等文体场所和工农剧团等文化团体，办有彭杨学校、护士学校、省委妇女学校、青年团校、工农中学、列宁小学等军地学校，亦有《共产党》《红军》《少年先锋》《经济建设报》《战旗报》等报纸37种，出版有《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列宁主义初步提纲》《中国共产党党章》《干部读本》《卫生常识》《革命歌舞》等26种书刊，红色歌谣、文艺演出、石刻标语，更是满山遍野，撒落民间。

苏区的功绩，可以说都是军民共建。

一大典型例子是，1933年10月红军开展宣（汉）达（县）战役，一举摧毁了川东王、老军阀刘存厚多年经营的老巢，缴获辉煌。要把总量达万吨的战利品搬运到苏区首府，难于上青天！通江人民和川陕根据地的各处群众，在硝烟未息的恶劣条件下，开路、建驿站、搬运同时进行。秋雨泥泞，数百里途，每日万人负重，历时一月，终将包括兵

工、造币、铅印三大厂全部设备、原材料在内的物资全部运到通江。20世纪30年代如此壮观的“巴人移山”图，不知有没有艺术家把它镌刻进历史的丰碑？

壮观之后还有奇迹：刘存厚建兵工厂，前后四、五年方才投产，经过大搬运一路损伤丢失，在通江山村，几时才能恢复生产？结果难以置信——不到两月，这座兵工厂就全部投产！

可歌可泣之“泣”：“整整一代人的牺牲”

没打过仗的唐代诗人杜甫有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打过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诗人陈毅在受勋之时，也曾别有所感慨地吟诵起古人的诗句“一将功成万骨枯”。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正所谓——“血染的风采”。在生命这个意义上，通江人民付出的代价非同一般。

据统计，当时仅有23万余人的通江，就有5万人参加红军，3000多名通江儿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和地方武装中的骨干，还有近5万通江儿女参加游击队、赤卫军、民警队、女子独立营、儿童团等地方武装与支前组织，红军战略转移时共6万人随军北上。新中国成立时，追随红军革命

的6万通江儿女仅存4000多人，5万余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建国后经人民政府追认的烈士6000余人。红军走后，还有不知其数的革命者、红军家人和亲属被反动派杀害。有关研究者的结论是：“通江为共和国的诞生整整牺牲了一代人”。此言不虚！

还有一种牺牲，岂只出师未捷，而是死于“莫须有”。这样的牺牲，只好用沉重与悲壮来为之述，为之泣。

通江的历史记忆中，此情此景，并非罕见。

因王明错误路线、张国焘“左”倾错误政策导致的肃反扩大化中，邝继勋是含冤被害者中较为典型的一例。邝继勋1926年入党，战功卓著，威信很高。他就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之职才一年多，便被诬陷为“国民党改组派”“右派”遭逮捕，1933年6月被秘密勒死于通江洪口场，年仅36岁。他的尸体是由苏区群众私下埋葬的。

活着的人也承载着别样的牺牲。

出生于通江春载乡擂鼓寨的赵有义88年的人生，可谓大波大折。红军入川，他因裁缝身份被选为工人代表，随即入党，成为县苏维埃主席，1934年川陕省戒烟总局成立又出任局长。赵有义工作作风风火火，废寝忘食，他下猛药，讲方法，终将为害甚广（包括红军内部一些官兵）的巴山烟害打了下去，整个苏区吸鸦片的人有70%戒掉烟毒。赵有义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的“南下”中，因病在甘孜成为“流落红军”，颠沛流离回乡之后，熬到解放，选为乡长兼农会主席，在地方宗派、历史恩怨的作用下，被错划成分，当了30年“冤枉地主”。当他弥留之际，屋门上贴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征北战人”的对联。

弹指84年，走进通江，巍峨新城内外，遗址犹存，举目皆是。红军广场上，新世纪的男女老幼，以矫健奔放的姿态，在身前巨幅浮雕中红军将士的凝视下即兴歌舞，“十送红军”的乐曲，绕城绕山，不绝于耳，不绝于心。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人民公仆 光辉照人

——怀念李子元同志

□ 雷新乾

今年7月9日是原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子元同志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子元同志原任中共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冬，中央决定调李子元同志任四川省委书记，安排我随调入川，做子元同志的秘书，一同来到“天府之国”工作。子元同志和我相识是1966年5月，直到1986年7月9日他不幸因心脏病去世为止。



讲政治，原则问题不让步

子元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始终是清醒的和坚定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动摇。“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于1967年1月发起向广东省委夺权，分头找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几位书记，并且首先找子元同志谈话，气势汹汹地叫他们认清形势，自动交权。当时子元同志任广东省委候补书记兼秘书长，他坚定地表示，权不能交，因为中共中央没有指示交权，省委常委没有研究过要交权。“造反派”的头头们见他态度坚决，便骂他是死顽固，甚至个别人对他动了手脚，他仍坚持权不能交。

1976年，“四人帮”在全国刮起了一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农业口的几个厅局的“造反派”们又掀起围攻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风浪，说他们是走资派还在走，一定要揪出来斗争，结果搞的机关几近陷于瘫痪。省农业局、气象局、水电厅都发生了此类事情。此时，子元同志已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他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约“造反派”负责人到省委来谈话，严肃地指出：你们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厅领导在政治上和工作上如有什么过错，你们可以批评，也可以按组织程序向省委反映，不能随意批斗，甚至体罚，一定要尽快纠正这种错误做法，

保证机关正常工作。此后一段时间，子元同志经常到这些厅局检查工作，避免发生上述类似事件，基本上保证了机关正常工作。子元同志作为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旗帜鲜明，同时坚持下乡抓生产，以实际行动抵制“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当时双流县委书记打算以主要精力做好稳定县、乡两级干部的工作，下力气抓好生产，尽量使农业和农村工作不受影响，专程来到子元同志家里汇报。子元同志说，你们的打算是对

的，说明你们政治上很清醒很敏感，就按你们的打算办吧。

心中始终挂着人民的利益

1969年9月，子元同志被“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工作，任广东省委常委兼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过去海南的经济十分落后，农业上是以亚热带作物为主，还是以农业为主，长期争论不休，两者都未能很好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群众生活比较艰苦，加上各种复杂因素，在海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子元同志没有向组织上讲价，愉快地到海南去工作，而且经常到基层去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海南20多个县，几年间全跑遍，有的去过几次，一到县上首先问群众生活的情况。他还经常挤时间跑广州，向省上争取各种资金和物资、各种建设项目、各种有利海南发展的政策。我较熟悉的原在海南工作的几个老县委书记，都亲口对我说过，在子元同志领导下工作，说不得假话，偷不得懒，尤其是对群众生活的情况必须清清楚楚，不能若明若暗，否则够你受批评，日子不会好过。1976年下半年，四川南充地区由于干旱发生灾情，群众粮食不够吃，子元同志亲自要省财办负责同志尽快把情况弄清楚，报经省委同意后向农业部报告争取救

灾粮款，并且驱车到南充救灾，和地区负责同志共商如何发展生产、采取补救措施，安排好群众生活。子元同志经常讲，四川省大、幅员广，如果不注意下基层，很多情况不容易搞清楚、也不容易搞准确，因此一定要多到基层去，群众生活究竟困难到何种程度，一看便知，光听汇报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加倍关心群众的疾苦，否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1977年夏季，四川发生严重伏旱，中央军委决定给四川拨2万多发溴化银人工降雨炮弹用以抗旱，这一年广东也遭大旱，尤其湛江地区干旱更甚，发生历史上空前的粮食紧缺。广东求援于四川，通过中央军委拨了1万发炮弹给广东，按比例定能分一部分给湛江地区。为了能多得一些炮弹，湛江地区又派气象局长专程来川求援，并带着当时的地委书记邹瑜的亲笔信来找子元同志。子元同志说，四川、广东都旱，中央已分别给两省解决了一部分人工降雨炮弹，湛江地区求援就不能再给了，四川是个大省，困难更大，我是四川省委书记，一定要为四川人民负责，一定要时刻想着四川人民的困难。不能认为我和邹瑜同志是好朋友，就再给一些，那是不行的。

忘我的工作精神

子元同志干起工作来有着惊人的毅力。解放初期，他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秘书长，对广东农村的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重要文件、社论和调查材料，他都亲自参与研究，有许多文件是他亲自动手写的。他经常伏案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子元同志不论在广东省委工作，还是在四川省委工作，经常到北京参加农业工作会议，往往是会议还未开完，就挂长途电话通知省里准备开会的时间、地点，安排会议材料。会议结束回到省上，不回家就紧接着又开会传达贯彻。他在海南任第一书记时，也是常常采取这个办法贯彻上级会议精神。

子元同志的一生里，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也从来没有带家属、子女玩过一次公园，真正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不知疲累。1976年夏天，四川省在峨眉县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峨眉县委、乐山地委、省计委及水电厅、农业厅的同志都劝子元同志抽空上峨眉山顶看看峨眉山的风光，他坚持不上去，会议一结束即回成都，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同年10月，子元同志到川鄂边界之交的巫溪县检查工作，归途当中，县委和万

县地委的同志们劝子元同志乘船到大宁河游览一下小三峡，他坚决不肯。子元同志由于长期紧张的工作，患上了慢性肾炎和腿、颈骨质增生多种疾病，本该早点住院治疗，结果硬是带着药物和治疗用具下乡调查研究，率队赴京参加全国农村工作会议。1977年3月，四川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由于病情加重，医生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劝他住院治疗，可他想到四川农业落后，粮食紧缺，为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他硬是住在医院里坚持工作，一边布置有关同志下乡调查，精心准备会议材料，一边在医院经常听汇报，和大家研究如何开好这次会，并从医院走到会场作工作报告。从1975年10月入川到1977年住院前，子元同志深入十多个地区、市、州和60多个县、市调查研究，当时四川农业战线和省委办公厅的同志们一直对他敬佩不已。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50年代，他任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期间，经常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基层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跟他一道下乡工作的同志担心他生活不习惯，他却泰然处之。他于60年代担任省委候补书记后，坚持不要专职秘书，住的是阴暗

的不足100平方米的普通旧房。他平时不讲究穿也不讲究吃，50年代初期把节省下来的钱大部分买了公债，买的公债全机关最多。他说：“现在国家百业待兴，我留下钱没有多少用，买了公债对国家有用。”他在海南工作时，由于家属、子女没及时从广州随迁过去，他在机关食堂吃饭，从不要求什么特殊照顾。有时下乡急，不吃饭就出发了。有时因开会误了吃饭时间，吃点饼干就算了。有一次到金堂县，就住在农民家里，当时农民缺粮，就用红薯切成方块和着大米蒸饭吃，子元同志说，这饭好吃，这不算艰苦。在穿衣问题上，子元同志十分简朴。记得1976年一次下乡的路上，子元同志下车到田间和农民攀谈，问寒问暖，群众看他挺客气，又见他穿一身朴素的衣着，根本没想到是一位“大官”，如果不是小汽车和我这个“随从”的话，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省委书记。还有一次，子元同志到乐山地区检查工作，路过眉山县，正遇上全县军民正在治理岷江的工地上大干，子元同志下车后，一边询问一边即操起一辆车架车拉起沙土来。消息很快传开，说省委的李书记来了，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他穿得很普通，加上一下车即汇入群众大干的洪流中，要

不是县委书记过来请他到工地上休息，群众还以为是误传呢！最令人感动的是一直到他去世，竟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临终还是组织上临时为他赶制了一套藏青色纯毛华达呢中山装，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其他领导同志向他遗体告别时，我看到子元同志身着这套中山装安卧在鲜花丛中，眼泪一下子淌下来，在场的同志无不泪流满面。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子元同志一生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不论职位多高，从不以权谋私，而且痛恨一切以权谋私的行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子元同志无论在广东、海南还是到四川省委工作，都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坚持参加劳动的问题。他不仅教育干部要参加劳动，自己首先身体力行。1976年春节，子元同志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集体到成都火车北站打扫卫生，同年5、6月份，四川省委常委全体同志到双流县机投公社参加劳动，子元同志当时已经病了，但他坚持参加。子元同志的家乡河北威县有不少亲属，都想仰仗他这个大官，找一个可端“铁饭碗”的工作，他都拒绝了，而且常说，凡是违背政策的事，我是六亲不认的。他的女儿初中毕业时要升

学，请求他帮忙，找个好学校，他不允许。1978年国家决定给40%的职工调升工资，当时子元同志爱人在四川省展览馆工作，他要求爱人主动表态放弃调升工资，优先照顾其他低工资的同志。子元同志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组织上为保证工作需要，给他配备了小汽车，他坚持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家属子女乘坐，凡是家里用车办私事的，经常督促秘书到行政部门交费。子元同志对学习抓得很紧，生病后也不放松学习。他自从1977年3月住院治疗后，比较多的时间是在医院和家里渡过的，病重时，还坚持让我挑重要的念给他听。他对自己患病不能重返工作岗位深感遗憾，不时地表露出热切希望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强烈愿望。

子元同志对自己和家属子女要求很严，对待周围的同志却关怀备至。基层干部到省委汇报工作，他都亲自叮嘱行政科要安排好食宿，不能懈怠。在广东省肇庆地委工作期间，

有一次警卫员在家乡的亲人生病，本人不好意思请假回去探望，他知道后，便主动叫警卫员回去看望亲人。我的父亲为支持我做好秘书工作，于1976年从河南老家来到成都，为我照顾小孩，由于我家经济条件不宽裕，父亲没什么衣服穿，子元同志就把他的衣服拿了两套让我父亲穿，他爱人知道我工资低，还主动给我些钱和粮票，叫我好好照顾老人。子元同志历来认为，凡是党的领导干部，哪怕是基层支部书记，都要以身作则，如有不以身作则者，子元同志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有一次他到金堂县检查工作，县委汇报说有一位支部书记搞特殊化，子元同志便点名批评了他。事后又让县上领导去关照他的进步，结果那位支书硬是转变了，改正了错误，以后的工作挺努力。

爱惜人才，关心培养 年轻干部

子元同志十分喜欢青年干

部，非常关心他们的工作和成长，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和栽培，经常勉励他们加强学习，努力工作，迅速提高思想和工作水平。他经常出题目、交方法，指导年轻干部搞调查，写文章，并亲自修改签发。记得有一次在乐山地区召开全省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会议，他和省农办、省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的同志共同研究、切磋会议的主题报告，直至天亮，有的同志累得坚持不了，他第二天照常开会。他所到之处，凡发现德才兼备的干练人才，就主动向组织部门推荐。即使对一些在工作中犯过错误而降级使用的干部，只要确是人才，又真正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并且工作有政绩的，他都主动向组织建议，重新重用。

子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每每回忆起过去和他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总是情不自禁地激起我对他无限的思念和敬仰之情。



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

与 自贡久大盐业

□ 曾永贵



中国近现代化工之父范旭东先生

1945年10月4日15时，中国民族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奠基人、史称中国化工之父的范旭东先生，因恶疾突发溘然长逝，终年62岁。当时，正在重庆举行国共和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闻此噩耗，立即决定谈判休会，并一同前往重庆沙坪坝范旭东先生家中吊祭。毛泽东当场亲笔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蒋介石也亲笔题写了“力行致用”的挽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还无不感

慨地说道：中国的工业发展，有4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卢作孚。

范旭东生于1883年10月24日，原名范源让，字明俊，湖南湘阴县人。范旭东乃范仲淹的后裔，6岁时丧父，随母亲谢氏和哥哥范源濂迁往湖南省长沙市定居，全靠母亲帮人浆洗衣服和针线手工勉强糊口。1894年，范旭东11岁，进入长沙市北乡捞刀河社会贤达吴镜蓉先生开设的私塾学馆启蒙读书。

1900年，范旭东随哥哥到日本后，先进入清华学校学日语，1905年毕业于歌山中学，同年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堂，1908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攻读应用化学。在日本读书期间，范旭东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强民富的景象，而当时之中国深受众列强的欺凌，国弱民穷，满目疮痍。于是暗暗立下志向：创办中国化学工业，以实

现实业救国之理想。为了表达并坚定自己的雄心壮志，他改名范锐，字旭东。

1910年，范旭东在京都帝国大学毕业，1911年回到中国，当时，虽然中国盐矿资源丰富，熬盐历史悠久，但是盐政腐败，制盐工艺落后，食盐杂质提炼不纯，造成舶来的洋盐充盈中国市场。此时，新生的民国政府也对盐政有改革之意，于是，委派范旭东等人到欧洲专门考察盐业，了解盐碱工业生产及发展状况。回国后，他便决定首先改良盐质。他与景韬白等人共同筹集股金5万元，于1914年7月在天津塘沽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范旭东任总经理（1914—1945）。公司研发出来的第一批精盐，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有粒盐、粉盐、砖盐。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星的商标，取名“海王星”。这一惊人的壮举，开创了我国化学工业的历史先河，为国人摘下了“食

土民族”的耻辱帽子。生产的精盐自产自销，由于价廉质优，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利润十分丰厚。从此，范旭东在中国工商界初露锋芒，在中国民族工业中独树化学工业之大旗，他的化工事业也得以迅速发展。

1917年冬，范旭东与陈调甫、王小徐三人在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今鞍山道）太和里范旭东自己家中，采用“苏尔维法”进行制碱试验，获得成功。但是，“苏尔维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专利垄断，范旭东决意开发中国的制碱工业。1918年11月，以范旭东为首共七人联手创办中国制碱工业，在天津塘沽召开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大会，建立了亚洲第一座制碱工厂，范旭东任总经理（1918—1945）。为了打破专利垄断，经过长达8年的反复试验，1926年6月29日，终于生产出纯净洁白的合格碱，全厂欢腾，举国欢呼。范旭东给产品取名为永利纯碱，以区别于外国的“洋碱”，品牌为“红三角牌”纯碱。范旭东成了“纯碱”的创造者和命名人。同年8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膺大会金质奖章，专家的评语是：“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范旭东在发展壮大自己的



1920年，拍摄于天津塘沽的久大精盐公司工人生产场景

化工事业中，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和聚集人才。他深信“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从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开始，就广泛招揽人才，先后聘用李焯尘、陈调甫、侯德榜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人员。1922年8月，他又创办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自任董事长（1922—1945），并且把他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所得酬金用作科研经费，专门从事化工研究，聘请著名化工专家、中国化工科技的开拓者孙学悟为社长。在孙学悟的主持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开创了中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促进了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的生产建设及西南地区化学工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化工科技人才，为中国化学工业的

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范旭东在北京创办静生生物研究所，聘请国内知名专家鉴定中国植物种类，为我国生物科学发展做出具有开拓创新的贡献。

范旭东在投资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方面慷慨解囊，倾力资助，曾任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子学校的董事长，为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奖学金，以资扶持优秀学生完成学业。

1928年9月，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海王》旬刊，作为宣传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合称“久永黄”）三大团体的窗口与喉舌。1933年，《海王》旬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倡导制定了“四大信条”：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

大局；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从此，这四大信条便形成了范氏企业永久性的团体精神。

1934年3月，范旭东改组旗下企业机构，成立“久永黄”联合办事处。1935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1936年，多方面筹措资金在南京六合县卸甲甸建设永利硫酸铵厂，实现中国基础化工——酸碱工业两翼

多次以优厚的条件利诱范旭东与之合作，遭到范旭东的断然拒绝。范旭东公开发誓：“宁举丧，不受奠仪”。愤然决定将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内迁到抗战大后方四川省，重新传承“久永黄”化工事业，开创华西化工基地，全力支援全国抗战与国家建设。从此，自贡盐业便与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先生结下不解之缘，自贡的

一批技术人才，因而支持久大迁来自贡建厂，并希望久大对自贡墨守成规的盐业生产技术进行一些改进。久大在抗战八年的艰苦条件下，为自贡盐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许多重大贡献。例如：平锅制盐和晒卤台的应用与推广、电机推卤、电焊与机械加工的创新，都为当时盐业生产技术带来了明显的科技进步与机械化的发展方向。首创开发卤水综合利用，提制食盐副产品，尤为自贡盐业生产技术划时代的重大改革创新。

1941年5月，范旭东决定从研究黑卤入手开发自贡食盐的副产品。特派黄河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国无机盐专家郭浩清来自贡调查研究黑卤的奥秘。郭浩清从1941年5月起至1943年3月止，用不到2年的时间，深入排查733眼盐井，对自贡黑卤进行了全面的化学分析与研究，绘制出黑卤综合利用流程图片，撰写出《四川黑卤研究初步报告》，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对黑卤较为完整准确的科研报告。此后，久大盐业创建恒丰副产部、三一化学制品厂等一批食盐副产品开发企业，研发出氯化钾、硼酸、硼砂、溴素、碘素、酒精、碳酸镁、碳酸钙、硫酸镁、乳酸钙、小苏打等化工产品。

1949年12月5日自贡市解放后，奄奄一息的盐化工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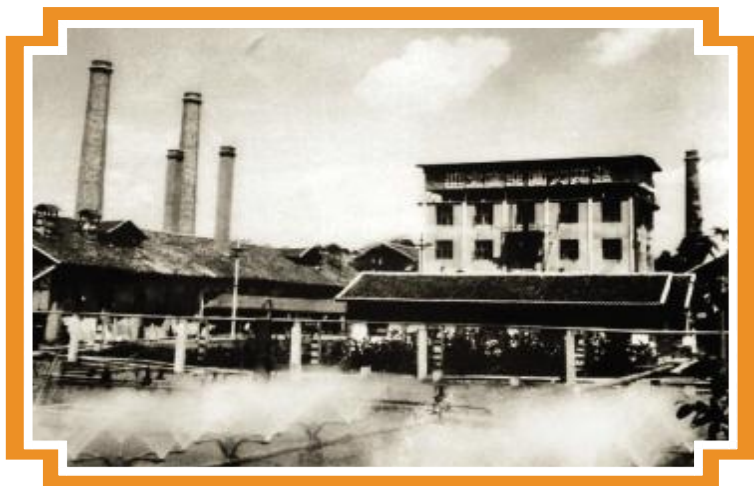
“久永黄”全体科技人才合影。前排右五为范旭东，右四为侯德榜

齐飞的梦想。1937年2月5日，中国首座合成氨工厂——永利南京铔厂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铔产品、中国第一包化学肥料。国人把该厂和美国的杜邦公司相媲美，称它为“远东第一大厂”，这也是中国人开创硫酸工业的启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天津塘沽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惨遭日寇劫占。日本军方

盐业化工也从此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1937年，范旭东将久大精盐公司（简称“久大”）迁来自流井（永利制碱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迁到乐山五通桥），在张家坝购地，筹建“久大盐业公司自贡模范制盐厂”（简称“久大盐厂”，也即张家坝制盐化工厂前身）。那时，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曾仰丰认为久大比较重视科学，有



久大重建的四川自贡模范盐厂真空制盐车间

开始复苏。当时由于国防需要，迫切急需增产的首先是氯化钾。1951年冬，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派娄玉春、萧元弼两位工程师前来自贡调查氯化钾生产情况后，建议一方面应减少胆巴、胆水的流失；另一方面应改进盐化工生产的工艺技术，这样，氯化钾可望增产。久大盐厂于1950年初，即大力增产氯化钾，同时，也生产一些硼酸、硼砂与溴素。

1952年初，成立自贡制盐新厂筹备处。在张家坝原久大盐厂厂址兴建一座中型制盐化工厂，发展盐化工生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自贡市最早的一个基本建设单位。从1953年底起，久大盐厂只经营贡井久大第二副产品处，张家坝久大第一副产品处则划归自贡制盐新厂筹备处经营管理。制盐新厂筹备处于1954年初改为新华第一制盐厂，1958年又改名张家

坝制盐化工厂。同年，久大贡井副产品二处又划归张家坝制盐化工厂统一管理。从此，自贡市只有张家坝制盐化工厂一家进行盐化工生产。

1958年初，中共自贡市委向全市人民发出“跨上千里马，奔向化工城”的号召，久大盐厂生产出超英赶美的氯化钡，震惊世界。完成了增产硼砂的硼酸糊冷冻工程，工人将

硼砂做成团徽，赠送给来厂视察的胡耀邦作纪念。此外，数十种化工产品也相继问世。

1990年底，为使盐业的个体优势和方面优势聚集为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自贡市对自贡盐业企业进行了结构重组，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于1991年3月8日正式成立，公司由自贡市大安盐厂等11个单位组成。共拥有固定资产原值4.6亿元，流动资金2.1亿元，具有资源开发、技术开发、装备开发、人才开发和对外发展五大功能，是一个集贸易、生产、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经济实体。

从此，范旭东先生创立的自贡久大盐业，自贡人民心目中的“老久大”退出历史舞台，以“新久大”身份建立的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登上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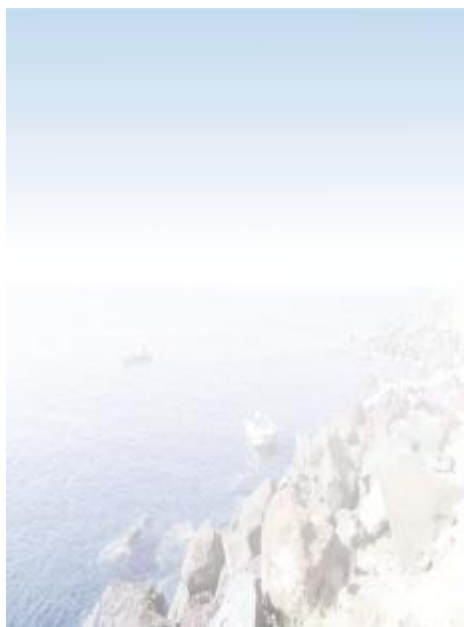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久大盐厂完成硼酸糊冷冻工程，1960年5月，工人将硼砂做成团徽，赠送给来厂视察的胡耀邦作纪念

唤起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对周敦颐的记忆

□ 周庆



几年前，老家浙江萧山给我寄来一本重修后的《周氏支谱》，没想到周敦颐竟是我的先祖！

周敦颐本人既有成都人的血统（周敦颐托朋友潘兴嗣为母亲郑氏所写的《墓志铭》中记载：“赠右谏议大夫周府君之配郑氏，其先成都人，左侍禁讳灿之女。”周敦颐即为后蜀孟昶朝左侍禁郑灿之女所生），且还是一位四川女婿，他的继室蒲氏，是太常丞、阆州人蒲师道之女。这位蒲氏夫人后来为周敦颐生下第二个儿子周焘。周敦颐不仅与四川在血缘

和姻亲上有着密切关系，还在学术思想上与蜀学和成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

说起周敦颐（号濂溪）其人，对国人来说，可算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说熟悉，是因为他的《爱莲说》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莫不能背诵这篇千古美文，其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名句更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座右铭。

说陌生，是因为周敦颐的主要身份是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贡献在于中国思想、哲学、教育史方面。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说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虽然古今学界对周敦颐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评价甚高，但对广大民众来说，理学却是一个“深奥、神秘”的领域。

理学是指一种新儒学，简

言之就是一种明理之学。宋代，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深入发展，儒学摆脱汉唐训诂，直探孔孟奥域，并吸收部分释、道学说，探明性命义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宋学阶段。宋代儒学是中国儒学史上的高峰时期，其发展辉煌璀璨，其影响深远巨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是“北宋五子”，旗帜性人物当属周敦颐。

什么是心性义理？“心性”是综合因素的表现，包括你自身所携带的“德”，包括修炼中能不能去忍、去悟。中国传统哲学是讲“天人合德”，周敦颐却用《太极图说》构建起了宇宙本体论。周敦颐认为无极产生出太极，然后依次化生出阴阳、天地、五行、四时、万物与人，由此便形成其万物化生论；周敦颐认为“物则不通，神妙万物”，万物产生的整个过程，以及万物产生之后的动静，都是无极神的推动下产生的，由此便形成其动静论；周敦颐认为由于万物和人是“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后产生的，人和万

物产生之后便由“无极之真”体现为“诚”的本性，由“二五之精”的“五行各一其性”而体现为“五性”，人的“诚”性和“五性”由静而动便产生善恶之分，由此便形成其性论，包括人性善恶论；周敦颐认为“诚”和“五性”受感而动之后，往往使人的行为产生恶多善少的结果，所以圣人便“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为人们确立起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和修养原则，由此便形成其道德论和修养论。这样，随着对宇宙发展图式的论述，形成了周敦颐哲学的宇宙本体论、万物化生论、动静论、性论（人性论）、道德论和修养论。依其对宇宙发展图式的论述，形成的整个哲学体系可称为宇宙图式论体系，这是周敦颐哲学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中国思想史杰出的贡献。

（二）

同整个宋学发展相一致，两宋时期的蜀学受其影响也得到鼎盛发展，学者辈出，学派众多，影响重大。提到“蜀学”，自然绕不开“理学”，也就绕不开“理学开山”周敦颐。

一是巴蜀为宋代理学发生和传播的重要地区。作为“理学开山鼻主”的周敦颐，不仅有入蜀合州（今重庆合川）佾书判官的经历，更有在蜀治学、讲学的经历。周敦颐在合州四年多时间，他的为官事迹因大水冲毁原官衙，历史档案

荡然无存而少有记录存世，而治学办学之事却多有传颂，这从他的弟子、朋友、同僚的诗赋和书信往来中都能看到。他不仅在合州开办州学，还创办书院。州学接纳州属各地的适龄子弟前来求学，书院却用以接待四面八方慕名前来的访问学者。

南宋朱熹高弟合州人度正在《周敦颐年谱》中这样记载：“盖当时乡贡之士，闻周子学问，多来求见耳”。周敦颐在给他遂宁弟子傅耆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些情况，说“自己从开春以来，因知州位缺，郡事特别繁忙，而稍有空闲，不是要接待过往访学者，就是要参加讲座，为大家答疑解惑，相当劳神疲惫，因此连你所求的策对都还未顾得上写，见谅见谅！”可想而知，每天他要见多少人？授多少课？而这些问学求教者不仅仅局限在本路本州（合州和遂州属梓州路）的乡贡之士，蜀地许多地方都有慕名前来的求教者。这可从利州路的《蓬州志略》中看出端倪：先生途经舟口，“学者知为学宗，攀留请业。先生赏其志，为秀者指示性道原委，为钝者讲明伦序大义。其后蓬人之就教于合者，岁数十辈。先生既去蜀，学者肖像祠而师之。”度正在《年谱》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先生“既去，相与祀之南禅，正少时犹及见之。”按上述记载：

当是指周敦颐离开蜀地后不久，就有蜀中学者为他建起生人祠，并以蜀人之师来祀之。铜梁县令吕陶在《送周茂叔殿丞序并诗》中说：“今年夏六月，官满南归，士大夫皆文以送。”对周敦颐在蜀的官声和学术思想，左丞蒲宗孟在《先生墓碣铭》中这样评价：“蜀之贤人君子，莫不喜称之。”

南宋何预签判合州时，应是见得周敦颐在此的遗迹和遗风的，所以他能说出：“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不待书而传之，以志晚学归敬之意，且以永邦人无穷之思！”这样看来，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蜀地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仅如此，周敦颐的两个弟子、理学开创性人物程颢和程颐兄弟也曾有过游学巴蜀的痕迹，传播过其思想。其他著名理学家或到巴蜀讲过学，或将思想由弟子传播进了巴蜀。

二是“《易》学在蜀”。治《周易》的传统从汉代严遵、扬雄开始一直在巴蜀流传。到宋代在巴蜀地上涌现出一批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易》学家。其中“道学宗主”周敦颐、理学大家程颐、陵州龙昌期、涪陵谯定、临邛张成行、资州李石等都是著名的《易》学家，而后者又多为周敦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就是在下层民众中也多有学《易》、治《易》的隐士。程颐随其父知汉州时，一次来到成都街

上，见一位手拿《易》的篋叟，一边读易，一边卖篋篋桶，程颐非常惊讶！两人便攀谈起来，而老翁就易之问题对答入流。程颐后来对弟子感叹地说：“《易》学在蜀耳，益往求之？”程颐在今重庆的涪陵留有“点《易》洞”遗迹，是他撰写《伊川易传》之所。所以，历代相传有“《易》学在蜀”的说法。

而周敦颐却是有宋以来开启《易》学的肇始者，这已在宋元明清的大儒和思想家那里就有了共识。凡今天之所学能知晓孔子《大易》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大学》《中庸》等七篇著作之意义者，皆从周先生这里发其端。因此说周先生之功，在于在哲学这片领域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周敦颐的挚友潘兴嗣在为其所写的《墓志铭》中就谈到他“深于易学”。从现有的史料可看到他在蜀中曾作过解易的《姤说》和《同人说》初稿。周敦颐的弟子遂宁人傅耆在看过这两篇文章后，回信给周先生说“蒙示《说姤》，意远而不迂，词简而有法。”“蒙寄贶《同人说》，徐展熟读，较以旧本，改易数字，皆人意所不到处，宜乎使人宗师仰慕之不暇也。”蜀人傅耆这话不是随便说说，他在之前三、四年中有游学周先生的经历，对先生从耳闻的敬仰，到实际感受到先生学术的魅力，

有一个循序渐进了解的过程，其间他曾拜读过周子不少的著作，包括《太极图说》和《通书》，因此他对周子思想的全貌已有比较清晰和完整的认识，方能以“宗师”这样的称谓去配先生。当时，川人吕陶对周敦颐也有类似评价。由此可见，周敦颐在蜀中治易讲易是有成果的，而他的易学著述和思想对川人和蜀学是产生过直接影响的。

(三)

周敦颐作为蜀人之师，早在北宋时就被许多川人认可，在他离开蜀地后不久，合川、蓬安等地就有人为他建祠，以蜀人之师祀之。

到了南宋，随着周敦颐学术地位不断提高，成都和简阳等地也相继为他建起祠堂。而这些祠堂并不是家族祠堂，而是像孔庙类的公祠，建在学府内和学府旁，由政府拨款或划拨祀田来专门供养，州、府官员率众春秋两季祭祀。

说到成都为周敦颐建祠之事，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趣闻。

南宋理学家吴猎，湖南潭州人。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乱导致的蜀乱刚被平定，朝廷既诏遣刑部侍郎吴猎出任四川宣抚使来安抚一方，旋即又升他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吴猎在四川数载，举贤任能，惩恶除奸，体察民情，减轻民赋；修

学宫，培养人才，为理学张栻学派的思想回流四川起了重大作用。

吴猎在成都任上，不仅修学宫、为蜀地培养大批人才，他还在学府中修建祭祀理学宗主周敦颐和程颢、程颐三先生的祠堂，大张旗鼓地在蜀地弘扬理学，和魏了翁、真德秀等人为道统正本清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四川蒲江人、南宋著名思想家魏了翁受邀为成都学府三先生祠作记时，记述了吴猎为周敦颐等人建祠的过程。他在《成都府学三先生祠记》中这样写道：“吴猎到四川后，以仁为本，广施善行，善于用人，精于理财；颇能宽民，多有惠政。旋既又擢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他因仰慕成都文翁学宫的悠久历史，便来到学宫视察和看望学子们，并为他们讲授义理。回府后他向幕僚感叹道：像汉代文翁那样的教育家，既建学又施教还能为人师表，这样有品有德之人，理应在学宫中为他建祠。正因为此，成都悠久的历史风范可谓当时西南之最，所以背着书箱来此学习的人特别多，学子涵盖了西南地区的六十州。然而像倡明儒学、让孔孟思想得以弘扬的大思想家周敦颐等人，却在这个地方未能设像，这实不合古人建祠的文化礼仪之意，令人遗憾。而对于此事，就连远在会余的表弟高

崇都感到疑惑来信询问：‘为什么周敦颐和二程三先生的祠堂在当时已遍布天下的情况下，何况周敦颐还曾经在四川合阳为官，传说蜀之贤人、君子受其教皆敬佩颂扬他。二程先生也曾伴随父亲太中公来蜀中广汉、成都公干，后来程颐还久居四川涪陵，著书立说较多。到今天他们的遗风余泽犹存，惠及后人，因而被世人春秋两季祭祀，却唯独成都这样的地方没有为他们建祠呢？这确有失风范，和当时成都的文化氛围不相符。’这让吴猎很受震动，于是他会同属下华阳知县度正、成都府教授杨寅恭、新简州教授王祖孙等人，选择了汉文翁高睽石室（今成都石室中学）之西为周敦颐和二程建起了‘三先生祠’，并将建安朱熹、广汉张栻这两位他的老师配享其中，以供后人祭祀。属官魏了翁为之作记”。

另外，按魏了翁记中所说：“吴猎受教于四川广汉人、理学大师张栻，因此能够尊其所闻，并教导其他人。在此建起三先生祠，又刻他们的遗著于成都府学学堂中，从此仿佛在蜀中有了号召力，读书者越来越多，到京师学习的人，直比齐鲁。至此以后，人们登三先生祠堂，拜其遗像，退下来再伏身读他们的著作，你能感受到三先生在教你做事的时候，首先教你学会做人，如果你真能感悟得道，在践行过程

中就不会有错，终会有成才那一天的！”当时的理学中人，在推尊周敦颐等人时，是以为人师表在做。吴猎等人也深受其真传，为学清纯，为官清正，故颇受四川百姓爱戴！

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丰厚的文化底蕴，曾让蜀学有过辉煌。蜀学作为一种学派，宋朝时直与齐鲁学比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心，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而湘学和蜀学的创立与发展，都与周敦颐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它们的交融与共同辉煌，能成为当世学术领域的两个重心，我想必定是有其共通的特点与联系，那就是儒家道统和周敦颐！

作为周敦颐的三十二代孙，我对四川抱有一颗感恩之心！正是由于有苏轼、蒲宗孟、傅耆、吕陶、李大临、费琦、何平仲、张宗范这群同时代的四川人的真实记述，丰富了中华史库，让我们今天能见周敦颐其人；由于有南宋合州人度正孜孜不倦地遍访搜寻，才会有现有史料的存世与再现，也才会有周敦颐《年谱》的编撰成功；由于有南宋广汉人张栻与婺远人朱熹等人



的发掘与推崇，才会使周敦颐“道学宗师”“理学开山”的地位得以确立；由于有李道传、李心传、魏了翁、李埴这些南宋四川人的前赴后继与执着鼎力争取，才会为周敦颐赢得“元公”谥号和入祀孔庙的机会，也才最终会使理学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才会让儒家思想流传至今。

文明历史的进程基本以千年为个结点，今天我们正好站在这个结点上，伟大的民族复兴梦正从这里起航。对待历史文明，尤其是儒家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需要我们对它有所认知，需要我们现代人用今天的智慧去看待它、重塑它、发扬光大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责任！

（作者系周敦颐的三十二代孙）

皇甫录《下陴纪谈》

的

地方史学价值述论

□ 卿远明

已淹没六百余年的顺庆知府皇甫录及其《下陴纪谈》被发现，是一个偶然的契机。这本薄薄的书页蕴含着十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埋藏六百余年、如矿藏般尘封的历史，对研究明朝中期的顺庆府，乃至川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等社会世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地方史学价值。



皇甫录，字也庸，号近峰，江苏长洲（即现在苏州）人。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弘治九年（1496）进士，曾任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礼部祠祭主事、精膳员外郎、仪制员外郎、仪制郎中。明正德八年（1513）出任顺庆知府。在任知府两年，因拒行贿赂，得罪巡按王纶。后王纶借皇甫录与酉阳土司之间的矛盾，煽动与皇甫录有旧隙的朝廷官员王萱弹劾皇甫录。明正德十年（1515）皇甫录遭弹劾卸职归家。在康熙二十五年刻本《顺庆府志·秩官》中有皇甫录名，但记为“长沙人，进士”，未载入“名宦”。

皇甫录出任顺庆知府时，正值本府营山人鄢本恕、蓝廷

瑞率领的盐民起义后期，鄢、蓝等头目已经被杀，其余党散掠巴蜀各地。“鄢、蓝之乱”以川东北为中心，波及顺庆。所以皇甫录在《下陴纪谈》中说：“予在顺庆二年，凡四御寇围城中。”皇甫录罢官回乡后，专注于著述，悠游于山水与教子。《（同治）苏州府志》传曰：“有别业在虎邱之旁，因号近峰，日以著述、游览为事。尤善教子，四子相继登科。而录夫妇偕老优游。”

《明史·文苑·皇甫湜传》中，记皇甫录生有四子：冲、湜、沔、濂。冲、沔二子于明嘉靖七年同登乡荐。次年，皇甫沔第进士。又过了三年，皇甫湜第进士。十三年后，第四子皇甫濂也第进士。兄弟四人并好学工诗，当地称之为“皇甫四杰”。



皇甫冲在《下陴纪谈序》中，引用父亲皇甫录语：“是编，王生雍所书，未经删定。吾作于兵戈之间。属汝以锄锄之隙，存其十五足矣。”说明《下陴纪谈》“作于兵戈之间”。《下陴纪谈》完成后，由王雍抄录，长子皇甫冲整理，并作序，还在《下陴纪谈》末尾附

自己撰写的《三峡山水记》一卷，今已失。皇甫冲还作过《顺庆公年谱》一卷，应该是为父亲皇甫录的编年谱，亦轶失。

《下陴纪谈》共上、下二卷，由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收藏。

皇甫冲在《下陴纪谈序》中说：“下陴纪谈者，家君守顺庆时谈纪也。”《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下陴纪谈》说：“是书乃其守四川顺庆府时所作。或载时事，或考前闻，大抵皆有关于是地者也。时值蓝鄢之乱，贼三犯顺庆，录授兵固守。以其登城则守陴，下陴则着书，故以下陴为名。”陴，即古城女墙。登陴则持械守城，下陴则处理政务，《下陴纪谈》是利用战事间歇作的笔记。这段文字将《下陴纪谈》的名称由来、内容特征都交待得十分明白。此书因为是皇甫录出任顺庆知府时的日常笔记，所记内容地域范围“大抵皆有关于是地者也（亦即顺庆府所辖地及周边地区）”。所谓“考前闻”，应该是本人出任顺庆知府时，为尽快熟悉本地情况，查阅府库所藏经籍和地方志，对顺庆府的建置沿革、文化渊源、历史人物、民间传说、风物特产等所作的摘录，以备政务所需；

其中也有自己实地考察作的记录。所谓“载时事”，就是记载在应对“鄢蓝之乱”中，自己及同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方法和取得的效果。

在《下陴纪谈序》中，皇甫冲原引父亲的话，以交待撰写此书的目的：“冲来，汝知其谈之所由乎？自……爰入我明，百五十余年，时康物阜，其衅易作，地险民偷，其乱难戡。蓝鄢小寇，一旦作孽，遂使井邑荡焚，髑髅盈野。廛会商渊之地，没为戎墟；金楹玉宇之宫，化为煨烬。昔贤之所表着，方輿之所记载，岂得而□□（原残）”，记录这些顺庆旧闻故事，以免这些文化积累因“鄢蓝之乱”而失传。

三

《下陴纪谈》分上、下两卷，以条目构架，或引典籍，或记时事，一事一记一个自然段，也没作严格分类，行文自然；体现了笔记体的随意、自然和不饰雕琢的风格。正是其自然朴实的风格，更显示出内容的实在性、史料的珍贵性和不容质疑的真实性。

在内容上，一是摘录过去的典籍、地方志。《下陴纪谈》中先后引用三十余部典籍，如《水经》《述异记》《方輿胜览》《搜神记》《中兴书》《汉志》《续博物志》《蜀汉本末》《海录碎事》《九域图》《尹子》《老学庵笔记》等；地方志有：《顺（庆府）志》《十道志》《开汉志》《益州志》《郡国志》《华阳（国）志》（自

注：括号内为本文作者增补，下同）《周地图记》《嘉陵志》等。

引用典籍、地方志，多是反应地方沿革，地名变更，治城迁徙以及相关地形地貌、山水出处等方面资料。如《方輿胜览》：“郡即安汉城。南充即安汉县。清居山两峯峭立。一水中盘。内有龙筍埧。宋淳佑间以兵乱徙府治于此山。下元至元初。尝建征南都元帅府。嘉陵江出大散关之西。去鳳州九十里。”

也有引用典籍，说明此地的物产。如《水经》：“安汉县虽迫山川。土地特美。蚕鱼盐家有焉。”《益州志》：“南充县西南六十里有昆井盐井。”或作补充说明，或给予中肯评价。如《桂坡遇录》：“广安州出金美玉饭。红腊紫梨。注谓金美鸭也。当是以鸭为羹。玉饭殆指香稻饭。红腊即火肉耳。今作美之法与梨种皆无存。”很明显“注谓”以后文，是笔者自注说明文字。或说明此地历代人文历史，风化状况。如《开汉志》：“在汉以忠节名义著。在唐以神仙浮屠显。在宋以文章学术称。盖指纪信谢自然程真人江万里蒲谦益冯休诸公也。”“盖指”以后文，是笔者自注详细说明的文字。

另一方面，则是笔者自己的实地考察记录，或政务记录，虽然没有记时间（或许是后来整理时删掉，也未可知）。从研究地方历史的角度讲，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是不容质疑的。

比如，关于顺庆置府的时间，在以往的地方志书或典籍中，大都语焉不详。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四川总志·顺庆府》是这样记录的：“本朝改顺庆府。洪武初年自北津渡迁城于此”。“洪武初年”几乎成了明以后所有的地方志书及典籍的共同语，包括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出现的记述巴蜀的书——《蜀中名胜记》，以及清康熙年间编修的《顺庆府志》。而在皇甫录的《下陴纪谈》中有明确的记载：“洪武四年置今府，领四县：南充、西充、营山、仪陇。州一：蓬。九年，改广安府为州。渠州为县。大竹、岳池皆隶于顺。邻水隶顺，则成化二年也。”

不仅顺庆的置府时间，各州县的变更、改隶都记得明明确确，这是其它书籍未见的。《下陴纪谈》对当时的顺庆城池记录如下：“顺庆旧惟土城，无夜警吾。苏沈中丞公林为郡时始议甃石，而公擢去因循，至蓝鄢之寇遂定甃计。而予适至。郡发帑库所积，贸民间阶除墙垣之石以缮，不旬月而城成。寇三犯顺庆，民兵喜跃乘城，守之有余力焉，贼竟不能攻。予既筑顺庆城，谓无井泉不可以守，乃取甃工于合州，穿十井。顺人皆江饮，颇不以为然，无何寇至，城闭几月，民赖以饮，而后知十井之为功也。御史王维贞请为铭而记之，予止之曰：此特一时之利耳，民终不饮此水。已而果

然。”

《下隍纪谈》将城墙以及城池内状况，修缮城墙和凿井的缘由、筹资措施、修缮经过，所起作用，民众反应，御史请铭都记得十分清楚。而这些内容在后来的地方志和典籍中从未见到。

还有一条比较独到史料，就是对南充白塔及附近建筑的考证记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四川总志·顺庆府》简单记述：“白石塔。南充东二十里。”在《下隍纪谈》中则记录详细：“东涉嘉陵江百步，得僧寺，傍有方塔，广可二仞，高二十余仞，层十有二。凡楹檐椽宇皆以甍甍，外施堊扁，曰玉龙万寿之塔。寺中一头陀能飞步其末。元夕燃花灯百枝倒影江水中，如宝珠瓔珞可爱。予尝寻断碑读之，乃知为翔龙观。塔今属之寺矣。曰翔龙者，必宋宁宗潜邸时名。或曰塔唐物也。观址在寺之左。”

由此可知，鹤鸣山上的白塔，在明时称“玉龙万寿塔”。附近有寺庙，皇甫录考断碑得知，其观原名为翔龙观，玉龙万寿塔应是该观的附属建筑；并认为与宋宁宗（当为理宗）有关。唐朝时是佛寺，宁（理）宗以后才改为道观。明朝时道观已废，只剩遗址断碑。

皇甫录对果山书院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所记内容与《蜀中名胜记》相当。《蜀中名胜记》说：“后郡人边速达以秘书监致仕，归隐于此”。而皇

甫录则推论“宋谯秀隐居读书处也”。后来的地方志都沿用《蜀中名胜记》的说法。

皇甫录在此地任职两年，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物产、风俗，也作过一些调查和记载。对顺庆城内穿着、行旅的记录十分有意思：“顺庆男不饴罗绮，女不乘舆。有则人必耻之至诋诟，以为浮薄。虽达官命妇，多布衣徒步焉。”说明当时顺庆城内民风十分纯正，不饰奢华，十分俭朴。

尽管当时有“蓝、鄢之乱”，人们端午节作赛社仍是十分热闹的：“顺庆以端午日赛社，作蛟舟，为水戏。舟制甚狭，仅可接膝，长短以人之多寡为差。皆相对持橈，船首击钲鼓，尾扬旗各一人，呼噪鼓勇，以趋先为胜。予诗有‘踏浪蛟船惊电掣，殷江鼉鼓忽雷同’之句，谬为士林所赏。”虽然文字不长，写得生动如实，画面感极强。

皇甫录考察“黄山谷撰张子履墓志”及墓志铭文摘录，使我们大致了解了张氏的移民过程。“黄山谷撰张子履墓志”题头，反映出黄山谷与墓主张子履不同寻常的关系；也再次印证了本地地方志记载的黄山谷曾经旅居顺庆的事实。

皇甫录在《下隍纪谈》中，还对顺庆的税赋、人才、同僚等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对当时保存或已毁的名胜古迹以及传说故事、相关诗文也作了记录。其中后溪翁的《清晖阁怀古诗》是后来的地

方志和书籍中未见过的。这首七言古诗对谯周大加赞颂，全诗以“吾闻南充今县治，蜀汉谯侯之故宅”开始，怀念“蜀汉谯侯”——谯周，抒发“我来缅想前贤风，皓首卧家余九十。客至但诵清晖阁，受此川光与山色”的感慨。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时期将谯周视为投降派，给予不公正的评价；而这首诗及其鲜明的如实评价和激情洋溢的赞颂，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全诗二十四句，加上南充县主簿的跋尾，共计249字。而皇甫录将此诗记入笔记中，可见其与诗者及南充县主簿有着同样的见识和共鸣。

四

明正德三年（1508），由湖广生员崔蓬头带领八十余人暴动，后来鄢本恕、廖惠率千余盐民响应，商人蓝廷瑞入伙。鄢、蓝、廖皆顺庆府人，号称拥有十万人马，纵横川、陕、湖广三省，活动的中心区域就在川东北一带，顺庆府自然是重灾区。在《下隍纪谈》中，记载顺庆府如何应对“鄢蓝之乱”的资料自然比其他书籍要详实，这也是此书的价值所在。

正德八年（1513）皇甫录出任顺庆知府。时鄢本恕、蓝廷瑞、廖惠等头目已经被杀，而鄢蓝裨将廖麻子为主的余党仍散掠巴蜀各地。按《下隍纪谈》记载，在皇甫录任职两年时间里，廖麻子余党“四入顺境”。为保一方平安，皇甫录到任后，着手完善顺庆城的防

御设施；穿井引水，充足水源。招募民兵，扩充队伍。一改过去无兵守，常为贼匪所扰的局面。

《下陴纪谈》对蓝郾起义军自创隐语、游击诱敌等作战方式也作了详细的记录；正因其行踪不定，难以歼灭，滋扰巴蜀等地达数年之久。所以，皇甫录叹曰：“呜呼。盗亦有道也。诚哉。”“廖贼用兵尤精。”

正德五年（1510）冬，郾本恕、蓝廷瑞攻打营山县，四川按察司佥事王源身中一刀六枪毙命。皇甫录对此作了详细记载，保留了王源的籍贯、官职、牺牲经过等重要信息，这也是其他史书难以见到的。皇甫录在《下陴纪谈》中还录了两件趣事：一是皇甫录效仿林俊毁郾、蓝祖坟的做法，挖开廖麻子祖坟。二是廖麻子将自己的两匹坐骑命名为林俊和皇甫录，以示侮辱。“廖有二善马，乃以林公与予名呼之，马亦能应声而至。”后来，官府遣使招抚这支起义军归顺朝廷后，皇甫录等又称这两匹马为“廖营长”。这两件事真实地反映了敌对双方不止在战场上斗智斗勇，在生活细节上互相借题侮辱对方的行为和心态，读来也很有趣。

五

《下陴纪谈》从篇幅上讲，并不能算作鸿篇巨著，但从地方史学角度讲，却有着独到的历史价值。

《下陴纪谈》的发现，弥

补了明清以后地方志资料的缺失，让这段历史逐渐清晰。清康熙年间编修的《顺庆府志》和清嘉庆年间编修的《南充县志》，以及从一些典籍引文中得到的片言只语，对明朝时期顺庆的历史记载十分模糊和简略。迁城经过、置府时间，当时城内真实情况都不甚清楚。而《下陴纪谈》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对明朝时期地方志是个重要补充。

从顺庆编修地方志史的角度讲，《下陴纪谈》保存的资料也填补了缺失。顺庆历来有编史修志的传统，但由于各种原因，完整保留下来的地方志很少。明朝时期的地方志，现在保留的唯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顺庆府志》，原刻本在国内已无存，只有从日本影印回国的胶卷，现存北京图书馆；清嘉庆十八年（1813）编修的《南充县志》中保留有任瀚的一篇序文。而皇甫录在《下陴纪谈》笔录的《开汉志》《郡国志》是宋朝时期编修的，说明皇甫录任知府时，府内还存有这两部志书。特别是“顺志，修于进贤樊侯，盖弘治癸丑间笔也”所透露出的信息，说明顺庆府曾在明弘治六年（即癸丑1493）编修过《顺庆府志》，比现存最早的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顺庆府志》还早五十年。

皇甫录在《下陴纪谈》摘录了“都尉娘”故事，内容与《蜀中名胜记》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所取资料的角度不同。皇

甫录重在保存“都尉娘”的故事，《蜀中名胜记》重在“都尉坝”地名的来历。不过皇甫录没有注明资料出处。《蜀中名胜记》中则明确注明这条资料取材于《嘉陵志》。《嘉陵志》不知修于何时，也未见其貌。在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明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中没见过此书的踪影。虽然不知什么原因皇甫录笔录了书的内容而未注明书名，但当时书已存在应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从文献角度讲，《下陴纪谈》保存了许多其它书籍中没有的文献信息。皇甫录在《下陴纪谈》中，笔录了三十余部典籍、地方志书和大量诗文，有的是见过的，有的是没见过的，他的发现为我们提供许多难得的线索。

《下陴纪谈》的史学价值，更多是体现在它的资料性上。无论是皇甫录笔录的典籍、地方志书和诗文，还是亲自考证并记录的大量人文史实、风俗民情，特别是对抗击郾蓝、守城护民等政务性记载，翔实的资料，不止对其他历史书籍可以起到佐证、补遗的作用，而且对本地历史发展进程也是一个全新发现，释解了许多过去不解疑问，并对当前的经济、文化建设将起到独特的作用。

注：文中除注明出处外，皆引自《下陴纪谈》。

（作者单位：南充市顺庆区地方志办公室）

从犍为郡的汉化过程看巴蜀 在西南夷开发中的作用

□ 石璞



“巴蜀”与“西南夷”之辨

“巴蜀”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读，狭义上的巴蜀为政区概念，专指战国末期以后的巴郡和蜀郡两地；广义上的巴蜀则是地理文化概念，指地理位置、经济水平、文化风俗都近于巴郡蜀郡的区域，如“巴蜀四郡”“三蜀”等均属广义上的巴蜀概念。“西南夷”的说法则始自司马迁，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出“西南夷”的史学概念，并称夜郎、靡莫、滇等“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中国古代的西南地区，大致以今天的四川、重庆、贵州、云南为主体，同时包括甘肃东南、陕西北部甚至越南的

一部分。班固称先秦时期“巴、蜀、广汉本南夷”，说明当时巴蜀之地尚为夷风。而司马迁明确提出“西南夷”是“巴蜀西南外蛮夷”，已经不再将巴蜀视为蛮夷之地，而是将巴蜀视为中原之地。这是因为自秦灭巴蜀以后，历经几代开发，巴蜀在秦汉之际已经由蛮夷之地进入“内华夏”的范畴，西南夷则无疑属“外夷狄”的范畴。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和张仪灭蜀，而后取巴，置巴郡、蜀郡，又分巴、蜀置汉中郡。从此秦国在巴蜀地区开始了一系列开发治理。李冰等蜀守积极开发巴蜀的农业、水利及铜铁等资源，极大的提高了巴蜀的经济地位。汉

文化在巴蜀也得到大范围传播，“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这个时期的巴蜀主要包括巴郡、蜀郡及从巴蜀两郡分出的汉中郡。按照司马迁“巴蜀西南外蛮夷”的标准来看，此时除巴郡、蜀郡、汉中郡的西南地区应都属于西南夷的范围。

汉高祖六年又置广汉郡。到汉武帝时，史载“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2]。此时的“巴蜀四郡”除巴郡、蜀郡、汉中郡以外，已包括广汉郡。后汉武帝又在西南夷之地增设七郡：犍为、牂牁、越嶲、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天汉四年，汉武帝撤沈犁郡并入蜀郡。

汉武帝建元六年置犍为郡。

司马迁总结武帝开拓西南夷之功是“剽分二方，卒为七郡”^⑬。七郡中包括犍为郡，说明在武帝之前，犍为一带仍是西南夷之地。而到西汉后期，其汉化程度已至“士多仁孝，女性贞专”^⑭。到晋时，《华阳国志》载：“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犍为已经被纳入华夏的范围。此前，汶山郡在汉宣帝地节三年已被废置，并入蜀郡。因此，武帝之后到东汉末巴蜀的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汶山在政治区划上被并入蜀地；二是犍为由原先的西南夷开始进入广义的巴蜀范畴。

东汉建安六年，刘璋分巴郡置巴西郡和巴东郡，合称“三巴”。建安二十二年，刘备析广汉置梓潼郡，治所在梓潼县。西晋永嘉之乱后梓潼郡治所变迁，与巴西郡同治涪县，合称巴西、梓潼二郡。巴东、巴西和梓潼三郡由巴蜀旧地分出，其经济、文化亦与巴蜀无异。因此东汉末至西晋广义上的巴蜀出现新的变化，蜀地包括蜀、广汉、汉中、犍为、梓潼五郡，巴地亦分为巴、巴西和巴东三郡。尽管巴地和犍为已被视为中原地区，但巴和犍为地区自始至终保留着不少夷族，实为汉夷混杂的边缘区域。汉武帝以后至西晋，西南夷的范围也发生了变化，永昌、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等地先后置郡，并置宁州督治南中诸郡，诸如牂牁、越嶲、

益州，武都等郡县地区逐渐汉化，脱离了“蛮夷”范畴。此时的西南夷主要聚居在尚未开发的西南地区或零散分布于西南各郡县之间。

开发犍为过程中巴蜀之作用

开发西南夷的工作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未置郡县的西南夷地区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控制；二是对已置郡县的地区进行治理和汉化。两项工作之间有一个关键的节点便是置郡县，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七郡，其中第一个郡就是犍为。汉武帝于建元六年为开南夷道在犍山一带置犍为郡，之后历代王朝开发西南夷过程中对犍为的治理都是重要内容。到西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时，已屡屡将犍为并入蜀地，说明其时犍为已被汉化。在这个汉化的过程中，犍为既经历了未置郡前的蛮夷身份，也经历了治理之后的华夏身份，其开发过程可谓是整个西南夷开发之缩影。

置郡前的开发 置郡之前，犍为地区本在犍山（今遵义娄山）一带。此时王朝的主要开发措施是对其加强控制以使其顺服。至晚在秦始皇时，秦人就在犍为地区设置了犍道，并由蜀郡辖管。战国时蜀守李冰还开通了自成都至犍道的路。又因李冰作江桥，蜀人深感便利，“于是江众多作桥……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

……”^⑮。汉武帝初年，因唐蒙在南越偶见枸酱，建议汉武帝开牂牁江道以发兵南越，武帝乃“令蜀通犍、青衣道”，又“拜唐蒙为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人，从巴蜀徼关入”。这条道路就是南夷道的重要部分。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认为“巴蜀徼关”是“巴符关”，在犍之北。犍后来成为犍为郡的首个治所。因此早在西南夷开发之初巴蜀与犍为地区就开通了道路。

巴蜀物产丰富，其枸酱、竹杖、粮食、桑蚕、铜铁等商品在西南夷地区都有流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铁器的传播。《史记》有载，卓氏在临邛开发铁矿“倾滇蜀之民”，程、郑也冶铸铁器“贾椎髻之民”。滇黔等地出土的汉代铁制农具多发现铸有“蜀郡”“成都”等铭文，说明巴蜀所铸铁器曾大量传入西南夷地区。从巴蜀至滇黔等地当走南夷道，途经犍为，可以推断巴蜀传入犍为之铁器不在少数。巴蜀物产传入犍为等地，既改变了当地居民生活也改变了其生产，对开发犍为经济意义尤为重大。

置郡后的治理 建元六年，汉武帝置犍为郡，朝廷在此建立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派遣中原官吏进行治理以维护地方稳定，对蛮夷之民进行汉化。这一阶段的治理依然得益于巴蜀的人力物力。

犍为建立了郡县体系后，

从事治理的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巴蜀地区，尤其是中央委派的高级官员中巴蜀籍人士甚多。笔者根据《华阳国志》统计出自西汉至西晋间记载的犍为太守共18人，除李溥籍贯不详外，其余17人中有12人来自巴郡、蜀郡、汉中郡和广汉郡。而《华阳国志》中尚有部分姓名已不可考的犍为郡守中也不乏巴蜀人士，如成都人寿良的父亲和祖父两代都曾任犍为太守。郡守不仅负责政治管理，还有开拓交通、发展经济、安抚百姓、平定叛乱等职责。除上述任郡守的巴蜀人士外，其他巴蜀人也在犍为的治理中做出重要贡献。如广汉人文齐在犍为属国朱提地区“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

治理犍为郡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风俗教化。改变夷风，使百姓认同中原政权是维护稳定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汉朝首先在犍为进行大规模移民。犍为“水通犍道，本有犍人……汉民多，渐斥徙之”，犍为水通越嵩，北接广汉，且汉朝施以“北人治南”的策略，移至犍为的中原之民自然多为巴蜀人。其次，王朝要对犍为的文化进行改造以使其附于中原。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评价武阳县曾说其“在犍为属县中开置最早而近蜀，故文化高于诸郡”。可见在汉文化传播上也存在自巴蜀向西向南推进的特点。

经济上，犍为郡也多仰仗

巴蜀的支持。汉武帝曾在“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其中就包括犍为郡在内的西南夷诸郡。“初郡”的治理政策是“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就是要求南阳、汉中以南之郡，依次就近对“初郡”进行财物上的扶持。南阳、汉中以南而临近犍为的只有巴、蜀、广汉三郡，可知犍为郡的日常开支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巴蜀。

在犍为置郡汉化这一过程中，巴蜀从政治、经济、文化、人力等多方面给予支持。究其原因，一是巴蜀具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且人力物力雄厚足以支持王朝的开发活动；二是王朝穷于应付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民族，对西南地区的蛮夷不甚重视。以上原因就使得巴蜀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犍为的汉化经过汉初至西晋的开发，犍为之文化、经济、政治均得到显著发展，至晚到西晋时犍为已被视同“华夏”。

汉化程度最重要的标准应在文化风俗方面。汉武帝置郡之前，犍为多夜郎族和犍族，风俗与汉大不相同。西汉末年移民迁入，汉民居多，其风俗已是“士多仁孝，女性贞专”。到晋代，常璩称其地“王乔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濠”，说法虽属荒诞，但王乔、彭祖本为中原传说人物，此时犍为亦有其传说，证明中原文化已经

两汉至西晋犍为太守统计表

姓名	籍贯	任内主要事迹
赵宣	汉中南郑	
任岐	蜀郡	起兵攻刘焉，战死
王士	广汉	
龚谌	巴郡安汉	
李严	南阳	“凿天社山，导江通车道”
李邈	广汉郫县	
何祗(只)	蜀郡郫县	
杨欣	天水	内迁之蜀
杨攸	天水	任监军
杜轸	蜀郡成都	“惠爱在民”
杜烈	蜀郡成都	
李苾	广汉郫县	对抗李特等人，未克
李庠	巴西宕渠	
魏纪	建宁	对抗李雄，失败被擒
李溥(溥)	(不详)	
雷照	朱提	“破牂柯、平夷、南广，北降李雄”
任元	蜀郡成都	
王顺	广汉郫县	

在犍为深入传播。还有诸如信士吕孟真、纪至行及孝子隗通、吴顺等人的故事，更有“王延世著勋河平，董钧为汉定礼”的事迹。此类人物及言行能作为美谈在当地流传，说明中原的道德价值观念已经广为犍为人接受。绥和元年，刘向还曾建议汉成帝在犍为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因此，犍为郡也出现大量士人。在《华阳国志》中可以统计到，仅两汉时期犍为郡的士人就有24人，西南地区士人总共187人，仅犍为一郡占据近13%的比例，尽管较汉中、蜀、广汉等郡士人数较少，却远多于南中诸郡。从汉化程度来看，犍为已经摆脱夷族身份。

经济上，犍为的水路交通日益便利，水利事业卓有成效，农业和工商业均有突出发展。其地土质不佳不宜五谷生长，但青稞、柑橘、茶叶、荔枝、姜、茺等特色作物产量颇大。政府甚至专门设官经营柑橘。此外犍为还出产有盐、铁、白玉等商品。到西晋时，犍为各县都不乏富商大户。

犍为的地域本由巴地割出，且其治所不断向北内迁，由瞿（今贵州遵义西）移至南广（今四川筠连县西南）再到犍道（今四川宜宾市区），新莽时又移至武阳（今四川彭山），从地理位置上看犍为郡愈来愈接近蜀郡。同时，中央王朝对犍为的管控已经相当牢

固。公孙述据蜀时，巴蜀等地均脱离中央管辖，郡曹朱遵却依然拼死据守。后光武帝嘉许犍为乃“士大夫之郡”。

至西晋时犍为的汉化已经完成，犍为不再被视为蛮夷，西晋时甚至将它与“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的巴蜀相提并论。当时“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把犍为郡的内容纳入《蜀志》，在介绍广汉郡的位置时又说广汉“南接蜀犍为”。这些都足以证明，晋人眼中犍为已是“蜀”的一部分，也是中原的一部分。

犍为在西南夷开发中的贡献

犍为汉化之前，中原王朝依托巴蜀四郡对其进行开发。犍为得到开发之后逐渐跻身“巴蜀”行列，对其他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做出了一定贡献。这个过程中犍为完成了由被开发者到开发者的身份转换。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犍为至巴蜀有青衣道、南夷道等，又有诸多栈道沟通越嵩、夜郎、滇等地。西汉于此地置郡最直接的考虑就是经略西南夷时交通便利。

犍为人才颇多，与巴蜀四郡的士人在南部诸郡任职一样，犍为籍士人也在其南部诸郡为政，如益州太守杨宗，建宁太守杨义，永昌太守吴顺，江阳太守张启等都不乏卓越政绩。

平定叛乱是治理西南夷最

主要的工作之一。汉武帝之后西南夷曾发生几次大规模叛乱，平乱工作即多仰仗巴蜀和犍为兵士。一方面因为巴、蜀、犍为靠近西南夷，行兵方便，补给及时，另一方面还因为“此种士兵，生活简朴。善于野战，能冒寒热，涉险远，贪赏敢死”。可以说犍为及巴蜀士兵在平定西南夷叛乱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自秦灭巴蜀之后，中原政权在巴蜀进行一系列开发治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将巴蜀纳入华夏文明的范围。在这一过程中，犍为郡逐渐汉化过程可视为西南夷开发过程的一处缩影，巴蜀对整个西南夷开发的作用从中可见一斑。但犍为的特殊性在于，其汉化过程是渐渐融入巴蜀的过程，犍为在西南夷开发中的参与亦可视为巴蜀的参与。明确这点，一来便于认清巴蜀在中国古代边疆开发和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再者，了解这段史实对于今天西南地区的治理和西南民族关系的处理亦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 [1][4][5][6]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3]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庄严的事业需要恭敬的态度，需要摒弃追求时尚与功利的心态，需要树立远大的理想与前瞻的眼光。当许多人在浮躁功利的当下为自己头上各种各样炫目的光环陶醉而激动不已的时候，还有一部分人怀揣着对学术、对人文、对历史、对未来的责任，怀揣着对我们自己文化的高度自信，埋首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默默坚守。这项工作没有追逐明星般的聚光灯，却是光荣而神圣的，是真正的远见卓识！

文献资料的重要性今天已经成为所有想要取得重大成就与重大突破的前提，而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必定是文献资料的爱护者、拥有者和运用者。如果说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文化昆仑，那么他所涉及到的古今中外各种文献资料就是成就这座文化昆仑的基石。因此，毋庸置疑地说明，文献资料的收集占有将决定你所占领的高地是不是真正有高度、广度和厚度，将决定你能否在百舸争流的大竞争、大挑战中赢得最后的荣光。文献数据也是地方志的生命，可以说，没有文献数据就没有志书！梁启超“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这句话对我们全方位、全息性地搜集各种文献资料提供了遵循。今天，我们有条件、有责任、有义务站在历代方志工作者的肩上，站在现代学术新的高度，站在

蜀藏序

高志刚

时代的前沿，以更大的气魄、更大的投入去构筑属于我们的文献资料的摩天大厦！

成都是蜀文化的中心。蜀文化以其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既与中原文化紧密相连，又与长江文化以及东部沿海的江浙文化通融，形成了具有原

创意义又独具魅力的特点，已经成为伟大的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两千多年来，在经学、文学、史学、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所谓“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蜀地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惟蜀有才，奇瑰磊落”，而凝聚着蜀文化精髓的历史文献则是祖先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价值。但是，这么富集的历史人文资源因长期的动荡以及地方政府的不重视，有许多文献资料都散失了，留下的也处于无人问津的分散而不系统的自然状态，遑论整理开发利用。这种情况如若长此以往，丰富而灿烂辉煌的文献资料将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值得幸庆的是历史的车轮驶入20世纪的时候，黎明降临东方。一方面晚清的达官贵人还在旧时空里鸭步鹅行，中华文化在西学东



渐的风潮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甲骨文被发现被释读，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一大批文献重见天日。当此之时，一批有识之士出于文化的高度自觉，毅然肩负起抢救文化遗产的重任，勇敢地行动起来！1910年，樊孔周，这是一个应该被历史记住的名字！这位成都出版家决心以一己之力出版荟萃历代文献总集的《蜀藏》。为此，他在成都总府街昌福馆创办成都最早的新式印刷公司——“昌福印刷公司”，前后出版《蜀藏》丛书八种，包括《全蜀艺文志》《蜀鉴》《双溪集》《刘杨合刊》《唐子潜书》《三王诗集》《小云词剩》《髯仙诗舫遗稿》等。时局的沧桑巨

变，文献搜集的异常艰辛，加之财力的不济，最终他未能克竟此业，但他毕竟启航了《蜀藏》。这一等就是一百年！

今天我们重新编纂出版《蜀藏》，就是从前人那里接过薪火相传的文化火炬，完成一百年前出版人未竟的事业。《蜀藏》荟萃了具有代表性的巴蜀文献典籍，特别是包括许多罕见的珍稀历史文献，按照一定的体例进行整理，分经学、史学、文学、舆地、舆图、方志、名胜、山水、旅游、教育、传记、经济、交通、民族、宗教、子学、艺术、水利、科技、医学、文集、丛书等二十二编，预计出版八百册（全套）。《蜀藏》将

真正成为反映几千年来巴蜀历史文化精髓的经典宝藏，将为后代子孙构建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献智库。如果说研究中国文化绕不开《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研究中国古代史绕不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三通》，研究佛学绕不开《大藏经》，研究道教绕不开《道藏》，那么从此研究巴蜀文化就绕不开《蜀藏》。

神圣的事业必将激发我们高度的责任，必将挖掘出为事业努力奋斗的潜力，在磨砺的过程中打造不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业绩。

（作者系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口述历史” 征文启事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过程，也是历史的主角。通过笔录、录音、录影等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历史，已经是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为全面收集、挖掘和抢救口述资料，客观、真实、准确记录历史原貌，《巴蜀史志》自2016年第1期起，将开设“口述历史”专栏，面向广大读者、作者公开征文，诚挚欢迎来稿。

征文要求：

1. 来稿要真实、原创，以自述、访谈、书信、回忆等形式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也

可以准确记述他人亲历的故事。口述事件、人物应该具有代表性，或者以小见大，能够反映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真相。字数一般控制在3000字内。

2. 欢迎自配图片，有录音、影像资料更佳。

3. 请勿一稿多投、重复投稿。编辑部在收到征文后2个月内审稿并以电子邮件告知处理结果。

投稿邮箱：bsszbjb@163.com。

联系电话：028-86522567。

《巴蜀史志》编辑部

《李庄镇志》与中国名镇志丛书 之《李庄镇志》述评

□ 李华蓉



《李庄镇志》于2006年5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78万字。在2008年获四川省第十二届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是志书类中唯一获得一等奖的乡镇志。

中国名镇志丛书之《李庄镇志》于2016年2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33万字。该志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实施《中国名镇志文化工程》的第一批十部乡镇志书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四川省名镇志书。该志的编写于2014年8月启动，采用省、市、区、镇四级联动的工作方式，数易其稿，形成以李庄抗战核心特色展开、系统记载李庄灿烂历史文化的方志书。

新出版的《李庄镇志》在坚守地方志书的底线中彰显了“名”与“特”。

内容的展示《李庄镇志》以李庄在抗战时期，李庄人民

以一封“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情真意切盛情相邀，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博物院、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近十个著名文化教育机构内迁李庄长达六年之久；童第周、傅斯年、李济、陶孟和、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梁方仲、李霖灿、梁思成、林徽因、吴定良、刘敦桢、劳干等知名专家学者云集李庄，而形成的与成都、昆明、重庆齐名的抗战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的辉煌历史沉淀作为核心特色，突显文化抗战内涵。在收录过程中，除基本区域地情外，凡特色不突出、特点不鲜明、特征不明显的内容原则均不录入。

框架的设计原《李庄镇志》使用章节体，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中篇结构，全书共十五篇，以志为主，大

量篇幅记述农业、工业、商贸、交通、邮电、城镇建设、财税金融、党派群团、教科文卫等内容。在文化篇中专设了“抗战文化”章节。

新出版的名镇《李庄镇志》突破原地方志书体裁的述、记、志、传、图、表、录七大基本体裁，使用条目体，通过类目“基本镇情”来表达李庄的“区位”“建置”“人口”“地貌”等基本内容。通过类目“文化抗战”下设“缘起与故事”“李庄时期的国立同济大学”“李庄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庄时期





色。类目“风土民情”突出记载了李庄特有的“一花”“二黄”“三白”“草龙舞”等。

三是在条目的筛选上。新出版的名镇

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李庄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李庄时期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庄时期的中国营造学社”“李庄时期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等分目，体现全书的核心特色内容，放大了各节点的细节，以深见长，展示了“抗战文化”全程的衍生文化，使李庄成为实至名归的“中国抗战文化之乡”，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类目“文物古迹”下记述了李庄众多的文物古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明清时期的川南民居、庙宇、殿堂、古街巷等文化特

分目、条目的筛选和设置。在核心特色“抗战文化”的统领下，横排中按照“不缺失主要事物、事物的主要方面和事物发展的重要阶段”要求，设置了次级核心特色群。首先对全书基础支撑系统进行了个性化选择，开展共性目次的个性化展示。对李庄镇的区位，直接从经济地理的角度以“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川南水码头”加以展示。其次，增设对李庄有独特意义的历史文化现象目次，设立分目“红色李庄”，展示革命老区乡镇的红色底蕴。三是对独有文化现象充分彰显唯一性和完整性。在“特色食品”分目下以“一花”“二黄”“三白”三个条目链条状完整讲述李庄的食品文化，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李庄草龙舞”升格为分目，详细讲述

李庄草龙舞的全过程，彰显民族风情、小镇魅力。四是在类目“艺文”中记载了“外地作者诗文”“本地作者诗文”“李庄名胜古迹楹联”“逸闻与传说”，突显李庄在历代文人眼中的魅力。五是在“附录”中设置了“李庄古镇游”“自驾游线路”“水果采摘游”“乡村一日游”等条目，助推古镇旅游发展。

表述的把关 新出版的名镇《李庄镇志》，在表述上有别于原《李庄镇志》行文用记述体、直陈其事、述而不论的记叙方式；虽然也使用记述体，以现代汉语语体文表述，文风严谨、朴实、简洁，可读性强，行文流畅，内容表述准确、清楚；但在语言用词上更加亮丽、鲜艳，色彩鲜明，可用形容词加以修饰。

新出版的名镇《李庄镇志》更加贴近群众生活，更赋娱乐性、趣味性，更具可读性，是一本集科学性、权威性、地域性于一体的名镇志；是记录和宣传李庄独特的自然、经济、社会和人文形态真实可信的权威性读本；是为各方面专家学者研究李庄提供的最基础、最可靠的地情信息和参考资料；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乡土教材；是李庄旅游产业发展的丰厚文化资源；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上乘的乡土志书。

（作者单位：宜宾市翠屏区地方志办公室）

家谱编修和地方志的殊途与联系

——以营山县近二十年家谱编修为例

□ 范虎

家谱，本是记录一个家族或宗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但在漫长历史境况下，家谱的编修与地方志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两者互相映衬和补充，和国史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三大文献。一部部家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志所记载的内涵。在古代，在一些特殊地区，一个小范围地区的历史往往就是一两个家族的家族史。

到清代，家谱的体例已经发展到非常完备。谱书的内容一般包括谱序、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祠堂、祠产、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仕宦记、传记、志录、寿文、贺序、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年表、余庆录、领谱字号等三十余项，并在实际编修过程中，根据各家族情况有所改变和增减，记载了一个家族的各个方面。家谱的功能从家族内部来说，一般具有“明血统、辨昭穆”的功能，可以防止近亲通婚，可以确立家族财产的继承次序，是家庭或家族祭把、服丧、守孝时掌握分寸，不失礼数的指导和依据。

这也是家谱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家谱可为社会变迁、人口史、宗族制度等的研究提供基本的材料和依据。

营山县近二十年家谱编修情况

总体情况 清代以来，营山民间素有修家谱以联宗亲的习俗，有宗祠自修族谱的，有原籍同族派人送族谱的。谱牒内容，一般载有谱序、姓氏考辨、家族源流、族规族训、律例、世系和已故历代祖先的葬地以及本族名人记事等。世系多以四言、五言或七言编成20至60字不等的韵句序列。营山人多由湖广等地迁入，家谱皆一一载明，各宗族都有族规，或载入族谱，或书于祠堂，作为训诫子孙的训条。解放后，封建族权和旧的家族习俗被废除，族规随时代变革而成为历史陈迹，世系观念逐渐淡漠，但按谱牒字辈命名的习俗仍然存在。近二十年来，营山民间编修家谱的积极性很高，许多家族都编修或重修了家谱。已知1994年至2014年，营山修谱情况如下表（见53页）。

四川营山方氏宗谱简介
该谱从2009年9月9日开始筹备

编写，2014年1月1日正式成书。在筹备编写之初，举行了筹备组成立大会，印发了《营山方氏宗谱续修倡议书》，制定了宗谱续写登记表，确定了启动编纂的时间。之后，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编纂事宜，确定人员及分工、编纂提纲、编纂模式、编写程序等。在编纂过程中，找到了清咸丰四年版《方氏族谱》等一些重要的物证和记录，并多次前往营山各方氏族人聚居处查找祖坟，到湖北孝感寻根问祖，拜望老人记录口述资料等，找到了大量的证据和资料。在资金筹集方面，设立流芳榜，向族人募集资金，用于编纂和印刷等。采用“集中与分散”的办公模式，确定了主编统筹、指导编纂的方式，做到“两校一核对”，提高宗谱质量。全谱共100万余字，彩图、彩照298幅，出版有16K国际豪华型绸面烫金压膜园背精装纸质版本和光碟式电子版本。该谱编排结构以篇、章、节、目为纲，结合图、记、志、传、表等形式成谱。全谱共五篇，分为卷首篇、清·咸丰谱篇、世系篇、功德篇和归统篇。

该谱是在清咸丰四年版《方氏族谱》的基础上续修而成。咸丰版族谱是清“湖广填四川”以来方氏家族135世兴山、兴先、兴财三支入营山的记录。续谱主要围绕这三支编写。三支后裔主要分布于营山的清水乡、高码乡、青山乡、

营山县家谱编纂情况表

序号	书名	编纂者	出书时间	页码
1	《罗氏宗谱》	罗玉泽	1994-02	369
2	《晏氏族谱》	晏良荣	1996-04	42
3	《何氏家谱》	何基友	2000-09-09	123
4	《黄氏家谱》	黄蔚昕	2000-12	216
5	《唐氏族谱》(营山西桥)	唐由义	2006-12	100
6	《苟氏家谱》	苟扬柏	2007-03	234
7	《陈氏族谱》(营山县星火镇西桥镇)	陈朝怀、陈旭彪等	2007-10	516
8	《刘氏宗谱》	刘泽笑	2008-01	128
9	《宋氏族谱》(营山通天)	《宋氏族谱》编委会	2009-04-05	186
10	《李氏族谱》	李名志	2009 秋	210
11	《陈氏宗亲族谱》(营山县明德乡陈家梁狮子头)	陈宗璋	2009-12-25	141
12	《晏氏族谱》(续修)	晏良华	2010-11	229
13	《段氏族谱》(营山磨刀溪)	段勇	2011-03	346
14	《王氏族谱》	王怀能	2011-06	165
15	《梁氏族谱》(营山县青山清水梁家山)	梁仁元	2012-07	127
16	《刘氏家乘》(蜀营邑茶盘山)	刘忠寿	2012-12	461
17	《冯氏家谱》(营山龙王寨)	冯兴礼	2013-04	122
18	《四川营山县龙氏家谱》	龙奕州	2013-09	683
19	《四川营山方氏宗谱》	方玲珑	2014-01-01	888
20	《马氏宗族家谱》(营山县回龙镇天台山马家石河)	马昌渠	2014-01-12	144
21	《中华萧氏总谱》(川北卷)	萧年庭	2014-03	1128

通天乡、安化乡、回龙镇、绿水镇、新店镇、福源乡、三兴乡、法堂乡等14个乡镇以及蓬安县部分乡镇，从135世从湖广黄洲府麻城县孝感乡入营山已经衍传17世，叙述了砚达宗支、其瑶宗支、汝富宗支等宗支30个。

该谱主要内容分为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人物传记、像赞、族徽、族旗、族歌、族赋、题词、人口分布图、族规与族训、世系、祠堂、领谱字号、人物、修谱历

程录、赞助榜等。谱序收录了清咸丰四年版《方氏族谱》原版谱序5篇，2009年版谱序1篇。谱中记载了方氏姓氏源流和方氏发源地的情况，收录了汉代张良，宋朝苏洵、苏轼，清乾隆皇帝为方氏的题词，标注了全国及营山的方姓人口分布图，定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教子一经”2条族训和6条族规。世系从始祖方雷氏开始，到入营山的三支，记录了营山方氏本宗所有男丁女口和婿，人口逾5000名。30个宗支

分别记述了该宗支人居分布图、繁衍序列图表、繁衍世系录，以每人为一个记录单元，载明姓名、家中排行、居住地址、生卒年月、坟墓考、配偶情况、子(媳)女(婿)情况，部分简单记载了技能特长、工作情况、学业情况。人物部分记载了方氏历史著名人物和营山、蓬安支系党、政、军、警、企业干部、科技人才及大专院校学生、现代知名人物。

家谱编修和地方志的殊途

家谱，毕竟是一家之典籍，尽管它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存在，但其编纂方式往往有异于地方志，对这些情况的研究，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来反思地方志编纂应该取舍的地方。

家族辉煌历史的重现 在编写家谱的过程中，源流考是一个重要章节。查看各族家谱，往往都会将自己的祖先和历史上有名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一般会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以彰显本家族具有辉煌的历史渊源，但都缺乏理性的考据。在营山《黄氏家谱》的序中，有如下句子：“今之生众，出于炎黄，得黄帝之姓氏，唯特我族，亦足傲然他族也。”营山《罗氏家谱》中也有：“罗氏本颛顼帝之苗裔也，帝姬姓。”地方志在记述一个地方的历史的过程中，必将严格遵守史实原则，对于民间的美好传说一概弃之。

家谱记载的片面之美 家

谱的记载主体是世系录，地方志的主体是各篇章的内容。家谱一般都会记载本宗族的著名人物或者重要家族精英，地方志同样会记载本区域、本行业的重要人物事迹。但是二者在表达上却有相当大的差距。家谱在记载世系录的时候，往往会对人物简单介绍，记载内容相当片面，没有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去陈述，缺乏历史感；一般记载优秀的、值得称赞的、有良好影响力的人物，没有记载一些反面典型，从而来反思一个家族内部教育、文化发展的缺失。地方志在记载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容的时候，是一种具有动感的表述，载明某个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勾画出当时历史大环境的大致轮廓；记载人物遵循“以事系人”原则，同时给反面人物立传。《营山县志》(1983版)中就记载了3个反面人物。对比地方志的记述，家谱的记载就显得十分片面，但是在片面中也体现了一个家族对于善的精神追求。

家谱与地方志的联系

家谱与地方志是相辅相成的，在内容上表现出很强烈的一致性，只是从不同的重点来表述同一段历史。这是家谱能成为地方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代特征 家谱记载了比较长时期的一段家族繁衍历史。其中大量的人名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面貌。在对营山不同家谱的综合分析后，我们发现，以改革开

放为节点，每家的姓名还是基本按照各自编好的字派顺序取名，以此可以分别出某个人在家族中的代数，从而达到长幼尊卑有序的效果。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21世纪之后的名字，以更多元的方式出现，基本没有按照原来的字派顺序取名。这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特征，而变化的规律也和地方志记录的时代背景有某种联系。除此之外，每个家族的家规族规也体现出时代特点，并且有许多糟粕。在年代稍远的营山济川《何氏族谱》中的族规就明确反映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妇道不为家族大道而贬斥。但是在2012年编撰的《梁氏族谱》中，就记载了合族公订的新族规，已经将“社会主义荣辱观”列入了族规的内容，并且在名录部分也记载了以前不记载的女儿的姓名和简介。这是一个时代在进步的表现。

相互印证 据《营山县志》记载，营山在清朝一共考取了26名进士，仅次于成都、华阳、富顺、涪陵，居全川第五位，有“科第仕宦，绵绵继继，甲于蜀都”的美誉。在这26名进士中，从姓氏上看：姓侯5人，姓于4人，姓陈3人，姓马、王、张、龚各2人，姓黄、易、李、白、罗各1人。他们大都出身于营山龚、侯、罗、马、李、于、陈、张八大望族，受到书香世家的影响。营山《罗氏宗谱》中就专门有一章明确记载了罗氏一门考取

功名的族人名单，从翰林罗愔到贡生罗秋月，共计75位，包含文生、武生、贡生、序生、举人、恩科、监生、岁贡等种类。这就有力地印证了罗氏一族在营山的确是家族兴旺，尊师重教，为营山八大望族之一应确信不疑。同时，各族谱中都记载了不同姓氏大都是由湖广填四川而迁来。一方面，各族在编修家谱的过程中有人专门去湖北寻找祖宗坟茔和踪迹，另一方面，他们在两地的县志中也找到相关证据。《营山县志》(1983版)中记载：“县城一李姓，清雍正8年(1730)5月由湖广省永州府东安县宣上乡四甲阴庇庙山脚迁入营山。”在《晏氏族谱(1996)》的序中有“宅后王向丙向立坟开基至于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奉旨填蜀四世祖婆尹氏携子仁舜字尔锡搬移四川北道顺庆府营山县南路金凤山置业一处，深塘寺置业一处”的说明。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吻合和印证。

家谱与地方志从古至今都相生相伴，潘光旦先生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将家谱和地方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比我们单地去研究地方志可能会寻找到更加开阔的视野。而家谱中的一些不可取的地方也可以带领我们反思地方志的编纂，从而提高地方志的整体水平。

(作者单位：营山县地方志办公室)

真情守望三十载

□ 陈文



今生相惜，岁月如歌，30年倾情付出，只为那浓浓的方志情缘——

作中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千万不能出错，你要切记切记！”。

单位给我分配的工作是打字，条件十分艰苦，用的是铅字打字机，俗称“敲敲机”。铅字打字机字盘是一个布满小方格的长方形铁盘子，大约有3000多格，每格一个字，字是反着放，打字员必须记住3000多个字在什么位置。备用的生僻字装在另外的几个盒子里，也必须记住这些字大概放在哪一盒。打字机操作一次只能把一个字粒打在蜡纸上，不仅要注意力集中，还要“埋头找字”。常用字能从字盘里找到，如果遇到生僻字就得从备用字盘中找，备用字里没有的字还得自己找偏旁部首来拼。

面对纷繁复杂、枯燥无味的打字工作，“咔哒、咔哒”的打字声伴随着我，我在苦中找乐，方志人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很快我对打字工作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记住了字盘所有字的位置，并熟练掌握了打字技巧，对于文字的运用也非常用心。“敲敲机”不像现在的电脑处理文稿那么简单方便，当打字

出现错误时，改正就很麻烦，因为打字蜡纸是用绵纸涂上蜡做成的，虽然打错字后可以用修正液涂抹后重打，但涂改多了蜡纸就容易打烂，会影响印刷质量，如果错漏太多只能换掉蜡纸重新打印；而且“敲敲机”没有存储功能，每改完一次稿子，就得重新再打一遍。虽然打字这项工作比较辛苦，还有点脏和累，特别是油印时，常常双手都沾满油墨，不注意脸上也会沾上，但我从没叫过苦和累，每次都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文稿的打印工作。这部“敲敲机”和一台油印机陪我完成了第一部《汶川县志》几百万字的全部打印、修改和部分乡镇志、部门志的打印工作，并参与审写稿的校对工作。从那时开始，我在工作中便养成做事仔细认真、反复检查的良好习惯，也为以后胜任编辑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文字基础。1992年，第一本汶川新县志出版；1993年，根据汶编发〔1993〕21号文《关于撤并县党办和县志办重新组建汶川县史志办公室的通知》，在人生的选择上，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继续留在县史志办，此时我

弹指一挥间，我已在县级地方志部门工作30个春秋，30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先后经历7任主任，见证了基层方志工作的发展历程，一代又一代的方志工作同仁们呕心沥血，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人们常说，一个人能够以爱好为工作，那是幸福的；如果能把工作变成爱好，那无疑更加幸福；我很幸运，在工作选择和兴趣爱好上，我情有独钟地方志工作。记得那是1987年的阳春三月，我被分配到县志办工作，当时汶川县志办刚成立不久（1985年5月成立），报到那天，首任汶川县志办主任孙长寿对我说：“我们干的是当代司马迁的活，虽然清贫枯燥，但是我们在记录历史，工

已深深地爱上了地方志事业。

1995年，随着现代化办公设施的引进，单位购买了第一台“四通”打字机，虽然这台打字机还不够先进，但是毕竟用显示屏代替了蜡纸，用26个字母的键盘代替了几千字的铅字字盘，省去机械的敲打，省时又省力。至此，结束了近十年机械打字的历史进入电子时代，铅字打字机也退居二线，楼道里再也听不见敲打字钉的“咔哒、咔哒”声。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台电子打印机时，心里还在打鼓，我能学会用这台机器吗？我能灵活地操作和应用它吗？可是不容我多想，还有那么多的文件、稿子在等着我，我必须马上熟悉和操作这台机器，我拿出当初学铅字打字机的那股劲，半天时间学会操作，三天记住五笔字根。到1997年后，随着现代化办公的进一步普及，单位配备了电脑、速印机等办公用品，“四通”打字机也随之淘汰。

2000年，按照省、州统一安排部署，汶川县作为第二轮新县志编纂试点县，我办进入《汶川县志(1986-2000)》的续编工作。当时单位只有我一个打字员，每天都要打印几万字的稿件，加班加点是常有事，但我从未有一声怨言、从未叫过苦。六个寒暑，多次增删，反复修改，完成从资料性手稿——长编稿——分志稿——交叉修改稿——通纂稿——总纂分稿——送审稿——评审稿——终审稿——审定稿的全部打印、修改、装订工作，《汶

川县志(1986-2000)》于2006年正式出版。

随着电脑的普及，人手都配备了电脑，不再有专职打字员。在打字岗位上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史志人，没有忘记去学习怎样编纂史志，并通过每次校对稿件的机会，认真领悟编纂要领，不懂的地方虚心请教，逐步使自己从一个对史志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成为单位骨干。2009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后，为使自己尽快进入角色，确立了“先入门、后入道、再求精”的学习思路，利用业余时间自我充电，通过不断的学习来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提高编纂水平，增强史学素养。

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先后整理了汶川县羌族古籍丛书《释比的故事》《羌族歌谣》原始资料，并已出版；参与汶川县古籍丛书《汶志纪略》《汶川县县志》(民国版)、《大禹志》(民国版)的整理出版；编辑了7本《汶川县党史大事记》(2009年至2015年)、8本《汶川县组织工作大事记》(2008年至2015年)；参与编写《5·12汶川特大地震汶川县抗震救灾志》、9本《汶川县年鉴》(2005年至2016年)；收集、整理、编写了《四川羌族通志》《阿坝州羌族志》《阿坝州黑水民兵志》汶川篇章、《中国县镇年鉴》汶川入编资料。1992年5月，荣获由中共汶川县委、县人民政府表彰的“新修《汶川县志》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荣誉；2008年11月，又荣获由中共汶川县

委、县人民政府表彰的“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先进个人”荣誉；2012年7月，荣获由中共阿坝州委、州人民政府表彰的“全州第二轮修志工作先进个人”荣誉。当看到一本本史料书籍问世，当完成的一项项工作受到州、县表彰，修志人独特的成就感让我无上光荣！

“得志者不修志，修志者不得志！”还有人认为，修志就是修“四苦全书”，艰苦、辛苦、清苦和痛苦。面对社会上的错误言论，我真没有这个感受。修志要耐得住寂寞，若要潜心钻研，又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痛苦，这是史志工作的真实写照。通过30年来的工作，我深深地感受到：编史修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浩瀚工程，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虽然出头露面少、工作周期长、出成绩慢，许多人不愿意干，但我从参加工作就爱上这行，能够参与其中我感到骄傲、自豪！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我困惑时，我能从史志工作中看到柳岸花明；在生活烦恼时，我能在史志工作中找到欢声笑语；在失落低沉时，我能在史志工作中找到人生坐标……史记、志书里流淌着我们的汗水，年鉴中跳动着我们的脉搏，这就是我们史志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与地方志的情缘也是毕生的！

(作者单位：汶川县史志办公室)

七旬老人牟百均带病坚持写村志

□ 张胜开 陈春秀



今年5月1日，四川省洪雅县东岳镇大安村村民们兴高采烈地祝贺《大安村志》出版了。

他们的高兴和感慨，更因为《大安村志》是一位74岁的老人，在病中坚持三年半的时间，夜以继日编纂出来的。

“村志是以基层行政单位为记述对象，全面盘点乡村地理、历史、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物产、人物等状况，视野独特，记录也更加细致，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村志出版了，我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所以我没有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因为我感觉自己没有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该村志的编纂者牟百均对笔者说。

写宗谱激发出写村志的灵感

洪雅县东岳镇大安村4组，幽幽山林中，一间古旧的木质老屋便是牟百均的家，屋外一间用塑料布搭建的窝棚内，摆满了各种历史及工具书籍，这就是牟百均的书房。

牟百均，1942年10月6日出生于洪雅县天宫乡大安村，年轻时当过兵，退伍后回到家乡务农。“解放前在村里的私塾里读过几个月的《三字经》，然后在天宫读完小学，就在家当农民至

今。”牟百均说。但他一直喜欢看书和写毛笔字，非常喜欢阅读历史一类的书籍，只要有机会出门，就会跑到书店买书。因此，文化不高，酷爱学习的牟百均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文化人。

2009年，有居住在大安村的张姓族人找到牟百均，希望他帮忙给村里的张姓写一部宗谱。牟百均说：“因为我在1992年患上肺气肿后，又转为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好，为了打发时光，我就答应了。”于是，牟百均就开始四处搜集采访张氏资料，几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张氏宗谱》。

牟百均认为这本宗谱应该由史志部门存档收藏，于是他就拿着这本宗谱找到洪雅县地方志办公室，恰巧遇见县志编辑白银福，白银福收下这本宗谱后，又回赠牟百均一本清嘉庆《洪雅县志》释注本。

“我回来后，在阅读这本县志时，突然产生灵感，就有了写我们村志的想法和冲动。”牟百均回忆道。因此，牟百均从2009年起，就开始留心搜集各种资料，为出版《大安村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次外出采访，他都是自掏腰包付来回车费，即便如此，牟百均还是感到无怨无悔。去止戈镇采访知情人士，因为没有钱，他只好请这位知情人士吃了一碗抄手。

在收集资料期间，牟百均在大安村3组发现一处开凿于明朝正德八年（1513）的石堰，堰长327米，用条石开U型凹槽连接而成。其中60米用乱石垒基础建于山崖边，有23米直接开凿于山石之上。石槽内口宽80厘米，深20厘米。为了让古堰能穿过山崖，古人用大大小小的石块于崖底筑堰基而上，高达3米。凿有U型凹槽的条石便垒在堰基之上。在山崖上有一突出岩石悬于石堰之上，石上“正德八年正月初六造”和“光绪一年十月止工”的字迹清晰可见。

“这都是编纂村志带给我的意外收获呀！”牟百均开心地说。

在收集整理村民姓氏中，他发现，即使是同姓，都不一定同宗，家风不一样，家训不尽同。他一一记录下来，作为编纂村志备用资料。



村志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2012年10月，大安村成立老年协会，他们纷纷动员牟百均加入。牟百均对老年协会的人说：“你们把我弄进来，我也不会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一直想写一部我们自己的村志。”没有想到，老年协会的老人们听说牟百均要写村志，非常高兴，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并成立了《大安村志》编纂委员会。洪雅县志办派编辑白银福对接牟百均，帮助他确定编写体例，提出编纂采用条目标体的建议；县委宣传部长尹鸿指示社科联把好编纂社会科学关。县委宣传部、县志办、县档案局等部门的主动介入，东岳镇政府的配合支持，为牟百均编纂村志增添了信心。

这个时候，牟百均才真正

开始动笔写村志。天有不测风云，12月，牟百均因冠心病住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我躺在病床上，感到自己活不下去了，就给我们村的文书白仲贵打电话说，我可能不行了，你要接着干，一定把我们的村志写完出版。”白仲贵说：“放心，村志就是你的精神支柱，你会挺过来的。”这还真让白仲贵说准了，在医院做完手术一个星期，牟百均就坚持出院，开始了村志的写作。“因为村志不比文学作品，是非常严谨的。所以，我就放大了村志的时间和空间，在采访了50多个老年人后，又获得了县档案馆的帮助，调阅了1000多张关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资料图片，又从《中国档案》《洪雅县志》《湖广填四川》等40多种史志资料中查阅资料。”牟百均对笔者说。

牟百均家里没有电脑，不能打开从县档案馆拷回来的资料，邻居袁学明就把自己家里可以打开储存卡的电视背过来，供牟百均使用。

“很多时候，半夜里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马上起床，写出来，然后再睡，不然怕第二天给忘记了。”牟百均说。

2013年7月，牟百均由于冠心病再次突发，不得不又住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当时家里没有一分钱，手术费都是老伴儿跟亲戚朋友借的。”牟百均感叹的说。

由于心里始终牵挂着村志，牟百均手术后，立即回家，着手他的村志编纂工作。

忠实记录严把关

牟百均认为，史志一定要严谨记录，这就是《大安村志》编纂最繁琐的事情。

“你看这条烟叶的条目，原产美洲，明弘治五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后逐渐传入亚洲，明末天启后由福建漳州人引种栽培；嘉庆二十一年，烟叶传入眉山，嘉庆二十三年，烟叶传入洪雅……这些都是经过严谨的考证后，又参考《眉山烟草志》，把关通过的。”牟百均指着《大安村志》第47页为笔者介绍道。

牟百均说：“我们这里富有浓郁的乡土文化，不说其他的，仅仅人们的称呼，就非常富有地域特色。”

据牟百均介绍，大安村以及附近的人，叫自己的父亲为“伯伯”，称呼父亲的哥哥为“大爷、二爷、三爷……”父亲的弟弟统一叫做“爸爸。”父亲之父叫大爷，大爷之妻叫“奶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年轻人进城学习务工的人越来越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称呼也已经蔓延到村里，家乡延续了数百年的各种民俗活动，许多正在渐渐消失，需要记录；改革开放以来，村里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铭记。村志是帮助村民了解家



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精神财富。”牟百均告诉笔者。

“1967年，广播喇叭安装入户”“1999年，村内首次安装固定电话”……村志里翔实的记录着大安村一个个走过的足迹。

有志者“志”竟成

牟百均顽强编纂村志的精神不但感动了村民，还感染了当地的史志和文化人士，他们开始协助牟百均开展工作。

“村志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史料，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史书或资料上查阅出处，这就是我放大空间和时间的目的。比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首辆汽车进入中国，就是我在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时看见后，马上记录下来的。”牟百均打开《大安村志》，仔细地给笔者讲解着。

“根本就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写呀写，有时我都睡了一觉，看见他还在写，有时凌晨一睁眼，看见他已经坐在桌子上写了。”牟百均的老伴儿胡家玺说。

牟百均介绍说：“村志编纂，在洪雅县是史无前例的，

属于百科全书，内容多，涉及面广，工程庞大，所以要想获得这些历史资料，只能一步一步的摸索前行，为了更加完善和详实，我在采访众多知情人士的基础上，在村内外广泛征集资料，同时还召集部分村民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和研究，加上定稿会和协商会议，竟然达到41次会议。”

众人拾柴火焰高，东岳镇政府召开村镇会议，要求镇、村干部为大安村志的编纂提供方便；洪雅县档案局为牟百均查阅资料大开绿灯，加班加点；洪雅县社科联为村志通关把脉，多次召开内容审议会；洪雅县志办派编辑白银福根据牟百均提供的资料，负责编辑成书，召开审稿会议，代表县政府完成外三审，并办理付印批文；《眉山日报》资深摄影记者巨源也为牟百均义务提供相关的珍贵历史图片。

当所有稿件全部交到印刷厂的时候，牟百均想委托书法家题写书名。当地文化界人士纷纷鼓励他自己题写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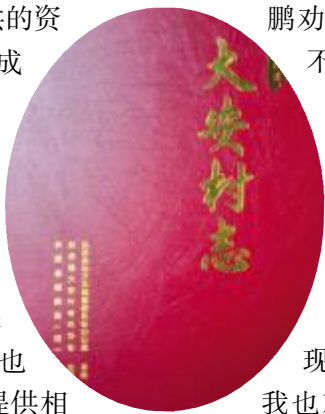
“因为2014年7月的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竟然昏倒在地，醒来后四五个小时不能说话，本来我从小喜欢写毛笔字，并在2009年开始研究书法，但这次摔倒后，手臂的神

经受到影响，再也写不出以前的样子了，但我还是按照村民们的要求，自己为村志题写了书名。”牟百均告诉笔者。

今年五一，经过牟百均三年半的思考准备，三年半不分昼夜的编纂，历经7年，56余万字的《大安村志》终于完成并出版。该村志共设类目32个、分类目141个、条目623个。志书图文并茂，翔实地记叙了大安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文风俗等内容，是一部串通大安村800多年历史的小百科全书，也是眉山市首部村民自主编纂完成的村志。

在《大安村志》的新闻发布会召开时，牟百均的表弟张鹏劝阻道：“你本来心脏就不好，你千万不要参加新闻发布会，以免到时一激动，又出了问题。”牟百均却说：“以前的激动，是害怕自己写不完这部村志，就永远的走了。现在村志既然出版了，我也就平静下来了。不会再有什么激动和兴奋了。”

“其实，我只是写了《大安村志》的内容，编辑、排版、校对以及费用，都是大家的，还有当地史志办的编审把关，所以，这本《大安村志》，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村民和有关部门、人士共同的成果。我仅仅感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留下这个遗憾而已。”牟百均这样认为。



省地方志办参与督导古蔺脱贫攻坚工作



8月29-31日，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孝平等一行5人，参加由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邓川带领的省扶贫开发专题督导组赴古蔺县蹲点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督导组先后深入双沙镇河屯村、东山村，箭竹乡富强村、大寨乡富民村，桂花乡香楠村、田坝村6个贫困村以及相关贫困户家中，实地详细检查“五个一”帮扶机制、年度脱贫工作计划项目落实情况，了解贫困户生产生活、就业就医和子女入学等情况，与村支部书记、“五个一”帮扶责任主体及贫困群众等进行深入交谈，认真听取了古蔺县委、县政府的脱贫攻坚工作汇报，现场询问、研究脱贫攻坚工作措施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邓川充分肯定了古蔺县脱贫攻坚的新的进步和发展。他指出，古蔺县委高度重视，把脱贫攻坚摆在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把中央、省委的最新要求，传达、传导到了各级干部身上、心上，压实了责任，上下同心，扎实推进，工作成效更加凸显，干部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他要求古蔺县委进一步增强

紧迫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进一步聚焦重点，强力攻坚。特别要注意聚焦“两不愁”，发展产业，确保就业，持续造血；聚焦义务教育，细致落实政策，作为阻断代际贫困的根本性措施；聚焦基本医疗保障，作为社会的生命线、安全线。进一步转变作风，真抓实干。严格考核，追责问责，把干部的自觉性与制度的约束力结合起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制度政策的适用性，增强稳定脱贫的精准性，把扶贫工作做细、做实，根据贫困地区群众不同的致贫原因和致富需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人施策。切实将扶贫开发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当前要突击奋战120天，全力做好贫困户住房易地迁建工作，全力打赢今年脱贫攻坚战。

省地方志办还见缝插针，分工协作，冒雨、徒步现场考察了田坝村产业扶贫生产基地，与帮扶的9户贫困户面对面座谈，听取进一步改进扶贫工作的意见，与乡、村领导干部协调、沟通了贫困户住房易地迁建、村文化室建设、为贫困户购买鸡苗、乡村道路建设等具体问题。
(吴琨)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省地方志办联合开展地方志工作执法调研



8月23-26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钟剑麟率地方志工作执法调研组前往阿坝州及红原县、理县开展地方志工作执法调研。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办公室、省地方志办政策法规宣传处全程参与执法调研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红原县地方志办公室、理县地方志办公室实地考察办公场所、人员配备、软硬件设施等情况，看望慰问方志办工作人员；听取阿坝州、红原县和理县政府贯彻落实两个《条例》《规划》《意见》情况以及依法修志、志鉴编纂、读志用志、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存在困难、意见建议等情况汇报。

钟剑麟对阿坝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及各级党政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对阿坝州地方志工作在发挥地方特色、服务中心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一是要依法行政，依法治志，贯彻实施好两个《条例》《规划》《意见》，落实并细化目标考核，依法开展地方志各项工作；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切实履行修志的官职官责，加强领导，尊重历史；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对地方志工作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系统工程的认识，民族地区的地方志工作作为民族文化的记录和传承，要发挥好围绕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作用，进一步重视方志工作，打开思路，增强工作主动性；四是要加大投入，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强化专业知识培训，多措并举留住人才，善于整合史志工作的社会资源；五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库房保障，使现有的资料、成果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

马小彬指出，阿坝州地方志工作在州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坚强领导和监督支持下，工作推动有力，有特色，有亮点：“一纳入、八到位”基本落实，班子配备完善，编制、经费保障有力；地方志工作在服务大局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and 地域优势。希望州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继续依法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监督和支持，出台相应文件，继续加强方志办班子建设，



加大资料征集、信息化、双语出版及方志馆建设等经费投入，统筹部署部门志、乡镇志以及红色文化、藏羌民族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等工作。他强调，州各级地方志办要全面推进地方志工作，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主动作为，启动部门志、乡镇志编纂，加强对藏羌民族文化、红色文化资源的抢救、保护、收集、整理，探索开展传统村落普查工作经验，加强地情资源开发，为州旅游事业和文化建设服务好；要有序推进双语出版工作进度，整合资源推进方志馆建设；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采取省州结合、走出去、引进来等多种方式强化专业培训，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保证。

(谢灵慧)

《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 召开第二十九次、三十次终审会



8月22日、9月30日，《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分别召开了《四川省志》第二十九次、三十次终审会。会议

集中审查《四川省志·国有资产管理志(1986-2005)》《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1986-2005)》和《四川省志·军事志(1986-2005)》《四川省志·审计志(1986-2005)》。审核委员会各成员对以上分卷的政治、保密、体例、史实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审查，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

会议认为：以上分卷终审送审稿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质量达到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和《四川省志》质量要求的有关规定，同意通过终审。会议要求以上分卷的牵头承编单位要严格按照终审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努力提升省志分卷质量，打造精品良志。

至此，《四川省志》分卷已有61个分卷通过省政府《四川省志》审核委员会终审验收。(黄文记、冯国梅)

集中智慧集体攻关 加强探索创新实践

——“年鉴编修与现代传播方式研究”课题进行集中研讨

由省地方志办主办、内江市志办承办的全省方志系统重点课题“年鉴编修与现代传播方式研究”集中研讨9月22日在内江举行。

省地方志办、省地方志学会下达课题研究任务后，各单位高度重视，会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探讨交流。除进行融贯古今、兼及中外的跨学科理论探求外，一些市州还组织外出学习考察，广泛交流讨论；一些单位提前进行了全域覆盖、全员参与的学术研讨，力争集思广益、精益求精。

集中研讨中，各课题单位围绕地方综合年鉴的读者定位、编纂组



织、篇目设计、传播运用、创新拓展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论文质量较高，观点较新颖，见解较独到，有成功经验的总结，有存在问题的剖析，有创新发展的建议，有推进实践的举措，实现了课题设置的目的和初衷。

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机关党

委书记王孝平传达了第一次全国年鉴工作会议精神。他肯定此次集中研讨交流成果超出预期，作风得到改进，队伍得到锻炼。指出要进一步研究、深化、综合研讨成果，形成课题总报告；要进一步思考加强成果转化，提出指导工作的具体对策；要进一步总结课题集体攻关经验，形成工作制度，用于工作实践。

内江市副市长陈朗会见了与会代表，市政府副秘书长罗建阳及德阳、资阳、广元、内江、凉山、雅安、攀枝花等市（州）志办和省交通厅史志总编室、省安办、四川年鉴社等课题单位参加了集中研讨。（刘忠安）

《四川当代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召开



9月14日，《四川当代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由省地方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马小彬主持，省地方志办党组成员、机关党委

书记王孝平出席会议。省委党校、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史编委会、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年鉴社等8个分卷牵头承编单位负责人、主编、编写人员，省地方志办市县志工作处、省志工作处负责人参会。

会上，各分卷承编单位通报了编纂工作进展情况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马小彬对各分卷编写组的辛勤工作和付出表示感谢和肯定，指出编纂《四川当代史》意义重大，使命光荣，时间紧迫。当时编纂的初衷是从老一辈领导中把史料抢救保护下来，把历史记忆留下来，进而还原历史真相。他要求各分卷编写组继续高度重视，有序整合力量、调配人力、克服困难、全力以赴，早日完成编纂任务；并针对座谈会上提出的资料收集难、编纂中敏感问题的处理、编写方法的把握、《大事辑要》分卷与分卷大事记关系的处理等作出明确指示。

王孝平要求省地方志办责任处室要认真梳理各分卷提出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全力做好沟通、协调和服务工作；各分卷承编单位要克服困难，倒排工期，按照合同约定早日完成编纂任务；各分卷之间要加强交流，做到信息和资源共享，共同推进编纂工作。（朱艳林）

在历史中寻找廉政智慧。从今年7月起，成都市地志办组织业务骨干，深入研究典籍文献，挖掘出了著名廉政典故“责子别妻”的主角新繁知县胡寿安、汉代伟大科学家张衡的爷爷张堪、三国蜀汉廉臣董和及董允父子、青菜官员王质等著名廉官故事，并计划在年底前写出30位廉政人物。

把历史的智慧告诉人们。市地志办负责历史人物故事挖掘，市纪委宣传部组织插画、音频等优化工作，迅速在“廉洁成都”网站、微信、微博平台推出了《廉说蓉城》栏目。“不贪太守”，四川第一位清官，家无私财的名臣，“蜀之所有还之于蜀”的巡抚，清俭绝伦的知县……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廉官故事迅速在全市传播开来。

清史镜鉴，启迪官智。9月，市纪委与市地志办在成都电视台联合推出两期《历史上的成都廉官》节目，不但讲述发生在成都这块土地上的清廉故事，还邀请专家鉴古知今，揭示廉洁故事的现实镜鉴意义，赢得机关干部、社区百姓的纷纷称赞，并得到市纪委主要领导的高度肯定。

专业化服务受到中纪委网站关注。市地志办主动服务廉政建设的工作，成为市纪委专业化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成功案例。9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及客户端“要闻”刊文，关注报道成都市纪委突出社会化、专业化和制度化，深入发掘本土历史文化元素，着力强化廉洁文化生态系统建设。成都市地志办专业化反腐倡廉提供历史智慧和智力支持，成为报道的重要内容，在全国推广。（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成都地志办服务廉政建设受到中纪委网站关注



德阳市志办于2014年启动方志资料室建设工作，2016年基本完成，登记上架各类书籍2478本、库存近千册。



近日，内江市以红色故事讲演和红色图片展览的形式举办“史志讲堂”专场活动。



眉山推出《笔尖上的方志》特刊。特刊分为“政策解读”“方志回顾”“大事记概览”“方志忆事”“方志人物”“方志认知”“方志媒体”“方志出版”等栏目，全刊共15万余字，160页，上百幅资料图片，展示出全市地方志系统35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取得成绩，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



8月16日，宜宾市翠屏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召开专题讨论会，研究《翠屏区精准扶贫图鉴》和《宜宾市旧城改造图志》编纂工作。



理县口述历史纪录片摄制工作成果丰硕：至2015年，完成了《涅槃重生》《藏羌走廊史话》《千年风雨话筹边楼》《国际友人伊莎白与理县》《博巴森根》《平民祭礼羌族释比》《理番五屯藏羌群英谱》和《羌戏一释比戏》等八部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全面、客观、真实地展示和再现了神秘的古羌文化，神奇多元的嘉绒文化和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屯兵精神以及历经灾难仍自强不息的抗震救灾精神。很多题材具有史料性、文献性和唯一性。

◆《汶川特大地震四川抗震救灾志》各分卷全部进入出版程序。该志编纂工作于2009年4月启动，历时5年完成初稿撰写；2015年年底，8个分卷通过终审验收，随即展开终审意见梳理、整理及资料补充工作。截至2016年3月底，共收到27家单位补充的“抢险救灾”资料和42家单位补充的“赈灾”资料。在对各分卷进行再次修改、调整、校对，集中解决各分卷统一性等问题后，于近期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展出版三审三校。

(陶利辉 牛森)

◆**泸州市**近日召开2016年半年党史和地方志系统工作会，安排部署全市下半年的党史和地方志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班子和队伍建设，查漏补缺，增添措施，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南充市**完成《南充市地方志志》总纂工作。今年5月下旬，《南充市地方志志》形成初稿后，边征求意见，边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总纂，于8月上旬基本完成总纂任务。8月中下旬，总纂人员对征求的建议意见，认真进行查证核实，修改完善，形成《南充市地方志志》送审稿。(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安市**近日召开地方志半年工作总结暨《广安家风研究》编纂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届八次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安市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精神，听取各县(市、区)地志办主任关于2016年地方志工作上半年情况汇报和下半年工作打算，研究《广安家风研究》编纂工作相关事宜并部署下半年工作。(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雅安市**重建办和市地方志办近日组织召开了《感恩援建》编纂工作座谈会，对该书编纂方案作说明，听取参会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各对口援建市驻雅安市各县(区)工作组(或前指挥部)、受援各县(区)重建办、地方志办以及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或撰稿人员参加了会议。(雅安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南充市嘉陵区**建立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进展情况月报制度。嘉陵区为动态掌握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情况，进一步推进志书编纂工作进度，近期印发了《关于建立全区首轮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进展情况月报制度的通知》，决定建立全区首轮乡镇(街道)志、部门志编纂工作进展整体情况和下月主要工作计划月报制度，月报时限为2016年8月至各单位志书编纂工作全面结束。区地志办每月对各单位月报材料汇总分析，形成月报分析材料，报区委、区政府领导，区委、区政府目标办视其情况适时进行通报。

(南充市嘉陵区地方志办公室)

◆**宜宾县**《宜宾县城五十年变迁》出版发行。该书主要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客观地记录了县城(柏溪)50年间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新区建设、城市管理、环境改善等变化。(宜宾县史志办公室)

◆**木里县**调增史志编制，有效解决“有人干事”问题。木里县认真贯彻落实史志工作“一纳入、八到位”要求，狠抓史志队伍建设，调增编制、充实力量，解决“有人干事”问题。在全县编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该县努力为史志部门调增了3名参公事业编制，增编后县史志办参公事业编制达6名，并聘用4人、借用2人、跟班学习1人，有效解决了该县史志部门编制缺、力量弱的问题，为“盛世编修史志”提供了队伍和人才保障。(木里县史志办公室)

◆**会理县**创新开展地方志工作宣传活动。一是重点宣传地方志工作“两《条例》—《办法》两《意见》三《规划》”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关于地方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等内容。二是要求有关部门制定有特色、有实效的宣传方案，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并适时开展2016年度宣传工作先进单位评选。三是分阶段确定宣传主题，陆续开展“笔尖上的方志”“指尖上的方志”“镜头里的方志”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会理县史志办公室)